

XUEXI YU PIPAN

学习与批判

2

1974

杨世承の三の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目 录

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

天兵怒气冲霄汉

——上钢五厂批林批孔侧记 金 风 (3)

不准林彪倒转历史车轮

——批林彪的“克己复礼” 上棉十七厂大批判组 (9)

斗则进，不斗则退

——斥“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求新造船厂铜工弯管小组 (11)

孔子的“仁”就是吃人 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一车间 中车小组 (13)

“韬晦”后面有文章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李志钧 (15)

帝修反为什么尊孔反法?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薛 源 (16)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 孔子和儒家之徒是一小撮政治骗子 康 立 (19)
-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反孔运动 黄 彦 (25)
- 哲学上的“倒过来”和政治上的“开倒车”
——批判林彪、孔子的“正名”说 仲 澜 廷 风 (29)
-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杨 敏 宗 廷 (32)
- 杂文：“独往独来”析 石望江 (33)
- 先秦思想家批孔言论辑录(资料) (35)

文学评论

- 斗争没有结束 常 峰 (51)
- 青年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
——谈谈电影文学剧本《陈玉成》 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 郑树清 (53)
上无四厂青年工人 莫建备

经济问题研究

- 抓好生产领域内的思想斗争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批判“谁发扬风格谁倒霉”
的错误思潮的调查报告 周 诚 王 华 (56)
- 论风格 树 人 (62)

各条战线都要为青年着想

- 全面关心插队知识青年的成长 孙 澄 (64)
- 《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 (66)

人物传记

- 张勋传 赵 清 (73)

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

天兵怒气冲霄汉

——上钢五厂批林批孔侧记

金 风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在上钢五厂，一个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以疾风暴雨之势，迅猛展开。

一走进这家万人大厂，到处是热烈紧张的战斗景象。工场周围和走道两旁，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大幅标语和漫画盖地铺天；有线广播里，批林批孔的怒吼声响彻十里钢城。广大工人群众坚决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在前一阶段批林批孔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新高潮。千军万马批林，千军万马批孔。连日来，从全厂的万人大会，到所有的车间、科室、工段、班组，都摆开了批林批孔的战场。“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已成为全厂工人共同的战斗口号。他们发扬一月革命风暴和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向着林彪和孔老二，向着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猛烈开火！

斩草须除根 批林要批孔

工人阶级对于批林批孔具有高度的觉悟，对林彪、孔老二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上钢五厂的工人说得好：“炼钢必须去硫去磷，革命就要批林批孔。”

第二电炉车间炼钢工、青年共产党员王鸿镔，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今年才二十多岁。他为了在全厂大会上批判孔子、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等反动谬论，连夜赶写批判稿。批判大会后，他又发动和带领工段的团员、青年，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一夜之间，使工段内贴满了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同志们问他累不累？他说：一夜不睡觉，眼睛红了，喉咙哑了，但是批林批孔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强了。我们青年就是要发扬“五四”革命传统，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的精神，“打倒孔家店，砸烂林家铺”，做批林批孔的急先锋。

象王鸿镔这样批林批孔的闯将，厂内越涌越多。在阶级斗争中久经锻炼的老工人，站

在这个斗争的前列。他们克服文化低的困难，奋勇当先。铸钢工段有十四位老工人，年龄最小的五十岁，最大的五十九岁。可是，他们一点不服老，组织了一个老工人战斗组，一连写了二十多篇批判稿，向林彪、孔子鼓吹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等反动谬论开炮。有一个老工人，早在两三个月前，就根据报上发表的材料，整理了孔子的反动论点一百多条。女工们也踊跃参战，她们豪迈地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也要顶起半边天。”这个厂有一千几百个家属工和里弄工，大部分是妇女，尽管识字不多，但是，她们批林批孔的积极性很高，不仅在厂内批判，有的还开了家庭批判会，向林彪、孔子宣战。

上钢五厂群众性批林批孔的斗争虽然开展还没有几天，但广大群众批林批孔的战斗故事说也说不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号令一下来，工人闻风而动。一月三十日，全厂批林批孔大会，到会九千多人。会前一小时，十个会场就挤得满满的。许多同志进不去，冒着寒风，站在走廊上、通道里和扩音器下，参加战斗，一直站了三个小时，始终精神抖擞。工人们都说：这样的场景从来没有过！

工人群众批林批孔的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来自他们对于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来自对批林批孔的伟大意义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斩草须除根，批林要批孔”，孔子和林彪，都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第二电炉车间综合小组老工人张小连、吴炳南，一个五十七岁，一个五十五岁。在组内批判林彪、孔子鼓吹的“克己复礼”这个反革命复辟纲领的时候，他们沉痛地回顾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大屠杀的情景。他们说：“什么是复辟？我们工人就看到过复辟，也最懂得什么是复辟。”这一年，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军阀，占领了上海。可是，混在革命队伍内的新军阀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工人和劳动人民重新投入血泊中。当年的蒋介石，也是满口的孔孟之道，要尊孔，要“复礼”，讲什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蒋介石要“复”什么“礼”？老工人愤怒地说：“那一年，许多阶级弟兄被杀害了。宝山路上，血迹斑斑。现在同志们每天从北站乘五十一路公共汽车到厂里上班，五十一路车站附近，就是当年反革命政变后屠杀我们工人兄弟的地方。这就是蒋介石的‘礼’。现在，林彪又鼓吹要‘克己复礼’，要复辟资本主义，也是妄想向我们工人和劳动人民开刀，使千百万人头落地……”

老工人的愤怒控诉激起了小组工人的满腔怒火。他们纷纷说：孔子是复辟的祖师爷。林彪、刘少奇、蒋介石以及一切反动头子，他们要复辟，总要尊孔，要把孔孟之道作为复辟的思想武器。工人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我们要革命，要前进，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就一定要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的精神，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把孔孟之道这个一切反动派搞复辟的思想理论基础，砸个稀巴烂。这是我们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这个小组的决心，表示了上钢五厂广大工人群众批林批孔的革命战斗意志。上钢五厂这几天的斗争形势充分表明：批林批孔是工人阶级的自觉要求，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历史上没有哪一个阶级，象工人阶级这样对批孔最坚决，最彻底。

工人最有发言权

工人阶级对批林批孔最内行，最有发言权。在深入批林批孔斗争刚展开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工人文化低，对孔子的书没有读、读不懂，担心批不起来。现在事实作了有力的回答。工人同志说：“批林批孔，不在文化高低，在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高低。”

这个厂的工人同志虽然过去大多数没有读过孔孟的书，但是，大部分工人解放前祖祖辈辈身受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吃尽了孔孟之道的苦，最有切身感受。因此，他们的批判最能抓住实质，打中要害。

供应科五十九岁的老工人、支部书记薛在东，在批判林彪、孔子鼓吹的“克己复礼为仁”的反动论点时，以自己解放前的血泪史，在批判大会上作了愤怒的控诉。他说：在旧社会里，我吃尽了孔老二“仁义”的苦，受尽了“忠恕”的罪。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被“仁”字吸干了血汗死去的。我九岁当童工，从小得了眼病，无钱医治，左眼完全失明，以后，就被满口“仁义道德”的资本家一脚踢出了厂门。他说：“孔子、林彪鼓吹的‘仁’究竟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吃人、害人、杀人、骗人。”

这位老工人的批判使厂内同志受到很大教育。他们说：“薛师傅短短几句话，就剥掉了孔子、林彪假仁假义的画皮，还了他们为奴隶主和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穷凶极恶的真面目。”

工人群众在旧社会里身受阶级压迫，他们最能用阶级的观点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对孔老二的某些观点一时看不清，工人群众一进行阶级分析，就一清二楚了。

原材料工段的一个小组在边议边批的时候，一个离开学校不久的青年工人提出了一个不理解的问题：“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反动的，但有些话，象‘三人行必有我师’，似乎还有点道理。”个别同志还认为：“孔老二这句话倒象蛮谦虚。”一位老工人马上说：“三人行——孔子没有跟劳动人民一起行，必有我师——孔子也没有拜过劳动人民为师。在旧社会里，没有哪个地主、资本家拜过我们工人和劳动人民做老师。”他这一说，大家就豁然开朗。一位老师傅又补充说：“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种菜，孔子说不知道，还骂樊迟是小人。在孔老二的眼里，劳动人民是卑贱、愚蠢的小人，他怎么会拜劳动人民为师呢？他说的‘必有我师’，是指奴隶主贵族。他是要向奴隶主贵族学习统治人民的反动本领。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工人群众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林彪和孔子，都是“巧伪人”，是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蔽起来，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伪装自己。因此，要彻底识破他们，把他们批深批透，必须借助于政治上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更好击中林彪、孔子的要害。

这些天来，在这个厂里，在掀起批林批孔斗争新高潮的同时，正在出现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第二电炉车间铸钢工段是上海钢铁工业战线学习马列著作

和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之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这个工段的二百多个工人,已先后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在这场批林批孔的斗争中,他们学习更努力、更勤奋了,这就大大提高了批林批孔的水平。这个工段丙班的工人,在批判林彪宣扬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时候,开始是用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压迫的苦难史,来批判林彪、孔子的“德”的虚伪性。以后,他们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有关论述,进一步看到林彪鼓吹孔子这个反动谬论的目的,是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制造舆论,建立他们林家父子的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从而使批判步步深入,进一步揭露了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

现在,这个厂正在根据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有关“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的精神,大力提倡在斗争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并且在许多车间以原中心学习组、哲学组为基础,逐步形成一支不脱产的工人阶级理论队伍。去年十月,厂内就以各车间的学习骨干为基础,建立了一个中国哲学史学习小组,对尊孔反法思想进行了批判。这次党中央号令一下来,他们都回到车间,成为批林批孔的骨干。现在,第二电炉车间从车间、工段到班组,已有一百多人的骨干队伍。他们既是学习的讲解员,又是班组讨论的宣传员,也是批林批孔的战斗员,更加发挥了工人阶级作为批林批孔主力军的战斗力。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上钢五厂正是沉浸在革命的节日气氛中。而“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当工人群众在批林批孔这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焕发出来的力量是难以估计的。群众的革命斗争成了带动各项工作前进的火车头。

一月三十日,全厂召开批林批孔大会的时候,正是第一电炉车间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月份生产计划的最后决战时刻。“砸烂孔家店,捣毁林家铺子”,一阵阵愤怒的批判声和口号声,从大会传到了正在夺高产的炼钢炉前。正是:会上群情激昂,炉内钢水更红。

一车间这个月一万五千吨电炉钢能不能拿到手,就要看今天能不能放一个高产。放高产,在钢厂并不罕见。而这次放高产,恰逢全厂批林批孔高潮正在掀起的时候,情况有点特殊。往常,逢到放高产的日子,全部人员集中,所有干部跟班,一切会议停开。但是,这两天,干部大多集中学习;全车间八百多人要抽三分之一参加全厂批林批孔大会;还要有一部分人突击写批判稿、画漫画、出专栏、造声势。怎么办?车间党总支在前一天的班组长会议上,不是光谈生产,而是首先大讲全国、全市、全厂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进一步传达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战斗号令,动员全车间工人群众积极投入这场政治斗争,并以多炼钢、炼好钢的实际行动狠狠打击林彪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这个会开得热气腾腾,干脆利索。没有一个人叫困难,没有一个人喊人少,而是叫干部安心学习,不要心挂两头;开大会抽人,要多少有多少。大家拍胸脯,一句话:批林批孔是批定了,一万五千吨钢是

拿定了。

当晚夜班，是夺高产的第一班。从炉前到浇钢，从料场到精整，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浑身是劲。几百个人拧成一股绳，步调空前一致，动作异常协调。到天亮，一个班拿下了二百七十吨钢，打响了夺高产的第一炮。接下来，早班的同志以更猛的劲头干了起来，他们说：“我们要用滚滚的钢铁洪流，把孔子、林彪连同他们的反动谬论一起烧成灰烬。”几个炉座你追我赶，一阵阵的出钢钟声不断传来高产的捷报。离下班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三号大炉长朱希圣发现一号平板坑由于浇铸小锭，工作量大，下一班有脱节的可能，他连忙带领小组的同志们，利用炉子正在通电的间隙时间，一起奔向一号平板坑，和平板工人肩并肩地大干起来，为下一班继续夺高产创造条件。这个早班，同样创造了优异成绩。刚下班，全班工人没有一个请假，整队进入了全厂批林批孔大会的会场。

中班平时是下午二点接班，这天，一点半全部进入车间，催早班同志提前下班参加大会，说：“你们狠狠批，好好听。这里有我们，夺高产错不了。”那时候，批判大会热火朝天，炼钢炉旁捷报频传。到中班的最后一炉钢出完，三个班的总产量达到了六百九十一吨的新纪录，比平时产量猛增百分之五十以上，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过去放高产，一般都把难炼的锋钢让路，这次不但不让，反而多炼。工人们说：这次在批林批孔高潮中放高产，不但放出了产量，而且放出了质量，放出了品种，放出了风格。

在群众革命的热潮中，许多原来似乎不大容易办到的事，现在办到了，而且办得更好。机动部的金工工段，在全厂大会后的第二天上午，召开了一个制造大型设备的会战会议。这个工段为了增强金加工能力，决定今年要造大龙门刨、大镗床、大滚齿机等大设备，自己武装自己。任务是年初就提出来了，但在落实中碰到不少困难。这次会议，打算进一步动员、落实。谁知会议一开始，大家不约而同地从昨天大会谈开了。有的说，林彪、孔老二的“上智下愚”，是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恶毒污蔑，哪一炉钢不是我们工人炼的？哪一台机器不是我们工人造的？有的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老二喻的是奴隶主主义，林彪喻的是资本主义，而我们无产阶级喻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场，土磨组首先保证，一定要把他们主动请战的一台移动镗床在“五一”前完成。刀具组接着自告奋勇，把几项大设备上的小件包了。钳工二组组长赵忠荣同志立即表示，不仅要按时拿下 T 68 大镗床，还要抽出两个工人支援土磨组。就这样，几项大设备的制造任务，在批林批孔声中做到了思想落实，组织落实，人员落实，把会战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

事后，干部们深有体会地说：不怕工作难，就怕不抓大事；不怕任务重，就怕不依靠群众。大事抓牢，纲举目张，高屋建瓴，一呼百应。

在斗争中前进

“真是想不到啊！”

这几天，这个厂的一些干部碰面时，常常这样又惊又喜地议论着。全厂批判大会之

后的当天晚上，在厂党委和厂革委会的常委会议上，大家心情十分激动。本来这个会只打算简短地部署一下下一步的工作，但是大家一坐下来，这个谈体会，那个说感触，发言非常热烈。保卫组长周大喜同志感慨地说，对今天这个大会，有三个“想不到”：出席人数这么多，想不到；会场秩序这么好，想不到；发言质量这么高，想不到。为什么想不到呢？这是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对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的作用估计不足的表现。的确，这次群众性批林批孔高潮，来势如此迅猛，一夜之间，全厂气氛大变，许多干部都“想不到”。说实话，这两天干部好象是被群众推着跑的。大家说，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我们往往把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单纯理解为生产上的干劲。而这次批林批孔高潮，使我们又一次看到，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最本质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积极性；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敢于反潮流的彻底革命精神。正是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群众教育了干部，使干部提高了抓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的自觉性，站到了斗争的前列。

全厂大会后的隔天一早，机动部金工工段的青年工人袁捷昆急冲冲地来找支部书记老洪，问工段的批判大会什么时候开。老洪说在下星期一，还得准备三、四天。“太迟了”，小袁急得喊了出来。“那你的批判稿写了没有？”老洪反问一句。“喏！”只听“刷”一下，小袁把连夜赶写的稿子亮了出来。这时另一个工人陈桂乐对老洪说：“批林批孔是一场思想大革命，你要注意这个‘大’字，可不要学小脚女人走路。”老洪这才感到不对头，回身就往班组里跑，征求工人群众意见，把批判会提前。这一下，干部和群众想到一块去了。一声动员，老洪刚回到办公室，十四篇批判稿送来了。第二天，全工段批判会开得群情激昂，热气腾腾；大字报、批判稿一夜之间象雪片那样盖满了工场前后。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批林批孔战斗在全工段打响了。

革命的群众运动历来是个伟大的学校。在生气勃勃的群众运动中，不仅干部受到了很大教育，群众自己也教育了自己。

这两天，五厂的工人同志纷纷议论：我们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要正当好主力军，担负起历史使命，我们做得还不够。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挖林彪路线的老根，挖林彪思想的“祖坟”，工人阶级不花大力气是不行的。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战斗能力。

“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现在，这个厂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正在进一步把批林批孔的斗争引向深入。广大工人群众正在紧密联系本单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开展专题批判，把批林批孔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月四日）

不准林彪倒转历史车轮

——批林彪的“克己复礼”

·上棉十七厂大批判组

“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时隔二千多年，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又重弹“克己复礼”的老调，用意何在？

林彪日思夜想“克己复礼”，这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正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沿着九大路线乘胜前进的时刻，林彪在此时此刻接二连三书写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把“克己复礼”当作最大的事，并且“唯此、唯此”反复强调，这显然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资本主义之“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实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了牛鬼蛇神，批判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资产阶级所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场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但是，林彪这个地富反坏右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眼看反动的社会基础被铲除，刘少奇叛徒集团垮了台，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复礼”。在他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狂叫要进行“一场新的夺权斗争”，要同革命人民作“你死我活斗争”，真是嚣张之极。他要夺谁的权呢？就是要夺我们在“一月革命”风暴中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的权，就是要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林彪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复礼”的反革命狼子野心，不就昭然若揭了吗！我们工人阶级最懂得政权的重要性。我们厂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厂，许多老工人解放前为啥做牛做马受欺压，就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解放后为啥我们能翻身当家作主人，就是因为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为啥能够干坏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工人起来造他们的反，为啥会受迫害，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权力。“一月革命”风暴中，我们夺回了这部分权力，把全厂的党政财文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里，使毛主席革命路线进一步得到了贯彻

执行。我们取得了胜利，但将要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要进行最后挣扎的。林彪扯起了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妄图反夺权，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若让林彪复了“礼”，我们劳动人民就要被打入地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怎能容忍！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复礼”目的，采取了孔老二那套“克己”的手段。孔子说，要以“以屈求伸”的办法保全自身，林彪就搞“暂栖身”、“韬晦”之计。孔子说，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林彪就说，“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孟子说，大人物说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林彪就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孟子说，讲人家不好的地方，招来后患怎么办呢？林彪就搞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由此可见，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克己”从来就是一切反动派搞反革命的惯用手法，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强大的条件下，阶级敌人懂得，如果不夹紧狐狸尾巴搞“克己”，他们的“复礼”阴谋就会马上原形毕露，连一天也混不下去。林彪一手搞“克己”，一手搞反革命武装政变，手法比他的祖师爷孔老二有过之而无不及。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自从孔老二抛出“克己复礼”这个反革命复辟纲领以来，我国历史上的反动派都用它来反对革命，镇压人民。宋代的反动儒家朱熹把“克己复礼”吹捧成“千圣相传心法之要”，作为进行反动统治的法宝。清朝刽子手曾国藩，也把“克己复礼”作为“支配万事万物”的准则，用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把“克己复礼”订入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须知》手册，作为复辟蒋家王朝的“精神基础”。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一切反动阶级都要搞复辟，开历史倒车，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我们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以后，不是又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可辩驳的伟大成就面前，不是仍然有人在背地里恶毒攻击、咒骂吗？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封、资、修的东西，不是又有“回潮”，或者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吗？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些新生事物，不是还有人百般挑剔、甚至阻碍、扼杀吗？社会上的反动思潮在我们厂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事实，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我们要革命，要前进，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总是要阻碍革命，开历史倒车。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一月革命”精神，深入批林批孔，挖掉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祖坟”，使他们“克己复礼”的复辟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历史的车轮是不可抗拒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梦想“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其结果只能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没落阶级代表一样，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斗则进，不斗则退

——斥“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求新造船厂 铜工弯管小组

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其反革命需要，狂热地鼓吹孔孟的“中庸之道”，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以此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林彪的“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用孔子的话来讲，叫做“和为贵”。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小组的同志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后，深深地懂得：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斗出来的，斗争才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拿我们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来说，就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坚持下来的。一九五八年，我组很多同志经受了反右整风运动的教育，从心底里体会到我们的斗争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主动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对此，刘少奇一伙惊恐万状。他们恶毒咒骂我们是“涂万金油”、“贴标签”；还凶狠地把全厂一百七十多个哲学小组砍掉了一百六十多个。面临这股逆流，我们就与它斗争。刘少奇一伙派人搜集黑材料，大家就针锋相对地把他们顶回去；刘少奇一伙指使一些人在学习的时间、地点上卡我们，我们就利用“业余的业余”时间到工人家里去学。十多年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激烈斗争中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试问，如果听信孔子、林彪一伙“和为贵”的鬼话，我们小组还能有今天吗？学习毛主席著作如此，生产斗争也同样是如此。一九五八年以前，我们小组的生产大部分是手工操作，只有一台苏修进口的“老爷弯管机”。苏修“专家”在厂时，还不许我们碰一碰，结果只好让它睡大觉。在总路线精神鼓舞下，大家打破了束缚我们工人手脚的条条框框，不顾有些人的风言风语，大胆地向这台机器开了一“刀”，使它重新投入战斗。以后，我们又同保守思想斗，坚持不断革新，不断实践，制造成功一台又一台的无芯弯管机、火焰弯管机，逐步实现了从笨重的手工操作向机械化、自动化的飞跃。试问：如果照孔子、林彪鼓吹的“和为贵”那套去做，我们弯管还不仍然是“沙子灌、榔头敲、炉灶烧”吗？牛头上有两只角，为的是防御和进攻；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讲斗争哲学，就是要通过革命斗争把人类的历史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林彪追随他的老祖宗孔子大叫“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是对他自己所谓“坚信马列”的嘲讽。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仇恨都不是抽象的，都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我们工人阶级所以仇恨资产阶级，是因为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我们的缘故。象我们的组长辛富林，十四岁就给资本家做工，天天干的是牛马活，顿顿吃的却是猪狗食。有一次，国民党军警抢了他买米的钞票，狠心的资本家毒打他，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只有无边无际的“仇”，没有一丝一毫的“和”。我们就是靠以毛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的武装斗争，才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今天，我们仍然要积极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保卫无产阶级江山。阶级敌人是“屋檐下的洋葱，根枯叶焦心不死”，我们不斗倒他们，他们就要斗倒我们，重新专我们的政。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有一度，车间领导埋头钻进了业务堆，一小撮阶级敌人便乘虚而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腐蚀青年工人。有个反革命分子竟图谋杀害革命干部。后来，车间领导发动群众斗了这些坏家伙，各项工作的面貌就为之一新。林彪闭眼不看这些铁的事实，却在阶级斗争剑拔弩张的一九六〇年抛出了“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他要“和”什么？是要我们同地、富、反、坏、右去讲“和”，同资产阶级去讲“和”，同修正主义去讲“和”。实际上，就是只允许阶级敌人斗我们，而我们在阶级敌人进攻面前，只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以此达到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到苏修的怀抱中、沦为苏修殖民地的罪恶目的。林彪一伙叛党卖国的蛇蝎之心，真是毒透毒透！

对阶级敌人我们必须坚决斗争，来不得半点调和与折中。对我们自己队伍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同样要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按照林彪胡说的“两斗皆仇，两和皆友”，我们同志之间就永远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了，因为一批评、一斗争，大家岂不都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了？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袭击，就要靠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进行思想斗争，扫除头脑里剥削阶级思想的灰尘，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这样才能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紧密地团结战斗，这怎么能够讲是“结仇”呢？相反，看到错误思想到处泛滥，看到阶级敌人拉着我们革命的同志往歪路上走，却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虽然求得了表面上的和平亲热，实际上正是害了同志，这又怎么能讲是“朋友”呢？十几年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教导，经常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武器，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交锋。有一个小青年刚来到我们小组，看到整天和管子打交道，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整天无精打采。组里的老工人发现后，就找他个别谈心，给他讲小组的组史，帮助他纠正怕苦怕累、不愿当弯管工的思想，使他跟上了大伙的前进步伐。积极的思想斗争把我们小组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促进，革命搞得轰轰烈烈，生产搞得蒸蒸日上。最近，我们批判了林彪步孔子后尘、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一月份生产任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大家还争取在二月份就把第一季度的任务全部“吃”下来。真是斗争出干劲哪！

这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的极好机会。现在，我们更加看清了孔子和林彪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他们表面上大叫“和为贵”、“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实际上根本不对劳动人民讲一点“和”。孔子看到有个奴隶主把起义的奴隶全部杀光后，高兴地说：“好，杀得好！要彻底斩草除根！”林彪更是身体力行，拚命拼凑反革命“联合舰队”，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把我们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狱，去吃二遍苦。他们的“和”是假，“斗”是真。所以，我们也必须来个以牙还牙，和他们坚决斗争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我们一定能够扫除一切象孔子、林彪那样的政治垃圾，斗出一个新世界来！

孔子的“仁”就是吃人

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一车间 中车小组

“仁”是孔子反动思想的核心。什么叫“仁”呢？孔子有一个娓娓动听的解释：“仁者爱人”也。

果真是“爱人”吗？

鲁迅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吃人”，这就是对孔子所鼓吹的“仁”最深刻的揭露。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都要“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反动家伙，有的恰恰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孔子自己就是这样。上台七天，杀了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少正卯；郑国的奴隶主血腥镇压了奴隶起义，孔子拍手大叫：“杀得好！”真是菩萨面孔，蛇蝎心肠，“爱人”是假，吃人是真。

对“仁”这个吃人的反动本质，我们工人阶级是最清楚的。万恶的旧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就拿我们厂来说，解放前，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模范”监狱。我们小组工作的地方，就是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牢房，大礼堂的舞台下面，是摧残革命志士的水牢，而在监狱门口，却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真是无耻之尤。其实，解放前的旧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本身就是一个人间地狱。广大劳动人民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悲惨生活。独夫民贼蒋介石开口“仁义”，闭口“忠恕”，摆出一副“仁”的面孔。可是蒋介石的“仁”，就是反共，就是杀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一句话，蒋介石的“仁”，就是对人民实行反革命专政的代名词。

嘴上满口“爱人”，手里却拿刀杀人，这岂不自相矛盾吗？一点也不矛盾，两样货色齐全，各有各的用处。列宁曾经指出：反动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

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孔子的“仁者爱人”之类的鬼话,正是一切剥削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粉饰剥削阶级的血腥统治,掩盖他们吃人面目的遮羞布。

自从人类产生阶级以后,就从来没有过超阶级的“爱人”。奴隶主不会爱奴隶,地主不会爱农民;反过来,奴隶、农民也决不会爱奴隶主、地主。解放前,我们工人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难道能叫我们去爱他们吗?解放以后,我们工人阶级掌了权,对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决不是要讲什么“仁爱”,而是要用暴力实行专政。但是,俗话说得好:乌龟爱王八。在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林彪一伙祭起孔子的“仁”的破旗,鼓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对阶级敌人“斗绝了”,并且叫嚷要把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对受无产阶级专政“迫害”的人,这样关怀备至,为他们谋“解放”,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这一小撮反动分子,正是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

林彪一伙如此起劲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他们真的不要专政吗?不。他们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要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罢了。孔子说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真是一语道破天机。鼓吹“仁者爱人”,目的还是为了“复礼”,即复辟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林彪一伙也是如此。他们要把那些“受迫害”的人统统“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上台掌权,其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用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天堂”,就是无产阶级的地狱。如果林彪一伙的阴谋得逞,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将会重新变成吃人的社会,人间的地狱。广大工人、农民又将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的!

毛主席早就说过:“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我们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就必须牢牢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法宝,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护身法宝。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阶级消灭之前,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弃之不用。当前,这场批林批孔的运动,就是一场深挖修正主义根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要当好主力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韬晦”后面有文章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李志钧

大凡历史上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劣根性:既虚弱,又狂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亲自向死党面授“韬讳(晦)”二字,并把它奉为阴谋复辟的“座右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不要轻看了“韬晦”二字,“韬晦”后面大有文章。

“韬晦”是掩藏的意思。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刘备就曾用过“韬晦”之计。曹操是反儒尊法、主张变革的,在汉末军阀混战之时,他在统一中国北方上发挥了一定作用。而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刘备却站在曹操的对立面,同汉朝的一些皇亲遗老勾结起来,以“复兴汉室”为名,策划发动政变。但是他又怕曹操发现他的阴谋,就到后园开了一块土地种菜,装出一副不关心政治的样子,以便麻痹曹操,等待时机,发动突然袭击。可见“韬晦”乃是用来掩盖某种见不得人的勾当的一种两面派权术。林彪正是以刘备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他把《三国演义》里赞扬刘备这一韬晦之计的诗句“勉从虎穴暂趋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亲笔抄录,并把“趋身”改为“栖身”,张挂在自己的黑窝里,就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什么是“韬晦”?“韬晦”,本义是“韬光晦迹”;在旧社会,还有“圣人韬光”这样的成语。原来,按照封建时代“君权天授”的说教,“真命天子”下凡,必然有非同常人的征兆,或有异光,或有奇香。《旧唐书》里记载有一个皇帝在年青未登位时,梦见乘龙上天,他母亲便叫他装痴作呆,“以事韬晦”,防止别人加害。可见“韬光晦迹”,不是一般的掩藏,而是指掩藏自己的野心和真面目,“韬”“圣人”之“光”,“晦”“真命天子”之“迹”。林彪搞“韬晦”,正是俨然以“真命天子”自居。林彪不是再三宣扬自己是“脑袋长得”“特别灵”、“和别人不一样”的“天才”吗?他不是公然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吗?“韬晦”二字,把他的狂妄野心暴露无遗了。

当然,什么“光”也好,“迹”也好,都从来没有存在过,都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谣言。凡是搞阴谋的人,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不仅要欺骗别人,也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这是由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的狂妄野心,把他们推到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上,因而他们只能是一小撮。他们恨不得一个早上骑到人民头上,但又时刻害怕人民把他们这一小撮揭露出来。他们越是狂妄,心目中就越只有自己,也就越是孤立,越要隐蔽自己;而越是孤立,也就越要想象自己怎么了不起,

是什么“独有”的超人，以便自欺欺人。“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不管林彪一伙怎样善于伪装，善于玩弄“韬晦”之计，也掩盖不了他们的反革命真象。在千百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面前，他们既“韬”不了“光”，也“晦”不了“迹”。温都尔汗草原上的熊熊火光把他们化为灰烬，就是这些玩弄“韬晦”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必然下场。

帝修反为什么尊孔反法？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薛 源

中外反动派都是尊孔的。近年来，国际上的帝、修、反又一次掀起了一股尊孔反法的恶浪，演出了一幕幕尊孔丑剧。

在这场丑剧中，表演得最起劲、闹得最凶的要算苏修。它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通过华语广播和各种出版机关，利用《历史问题》、《哲学问题》、《远东问题》、《文学报》等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和专著，大叫大嚷，大肆吹捧孔老二。把这个毕生开历史倒车、妄图复辟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代表人物，说成是“关心人民”、“为人民利益”、起“进步作用”的新社会力量代表。同时，又竭力诋毁法家，把它说成是“反动的”，“反人道主义”的，污蔑法家学说“立足于棍棒纪律和严酷惩罚之上”，“全面消灭教育和文化”。并拚命攻击秦始皇，说他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之一”，凡怀疑他禁书措施的就有被流放去“改造”和“再教育”的危险。当一九七二年《红旗》杂志发表对尊孔反法思潮的批判文章后，更触痛了苏修神经，于是乎狂吠乱叫，借反对法家为名，疯狂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说什么“介绍古代帝制中国某些理论家的概念，同时使人直接联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过的事情。……正是在这里需要那些帝制的观念，如神化统治者的权力，统一思想，反理性主义，赞美战争”。很明显，苏修搞尊孔反法，矛头是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向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美国，也有一些人那里搞尊孔。他们鼓吹只有孔子的学派“在历代中有影响”，是“完善的”，“不仅把中国民族结合成一个整体，而且也统治了中国的邻邦”。他们还竭力把孔老二描绘成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化身，把他说成是“关怀人民”，主张“平等”，具有“真正的民主同情心”的人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还作出决定，自一九七三年起，以孔子的生日作为该州“教师节”。旧金山圣荷西地方还在筹建一个“孔子纪念公园”，园

内准备树立一个高达四十三英尺的孔子雕像。

还有西贡伪政权,也在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表演了一幕尊孔活剧。由南越傀儡政权总理陈善谦亲自出马,主持了一项所谓“纪念孔子诞辰”的仪式。

人们会问:为什么国际上的一切最腐朽的反动势力会如此关心孔子这具政治僵尸?为什么他们要拚命反对、恶毒咒骂我们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斗争?为什么他们在维护孔子亡灵这一点上和林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回答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剥削阶级本质,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一切倒退的、腐朽的、搞复辟的反动阶级,总是要借助孔子的幽灵来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他们在孔子的身上,找到了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新神圣同盟的思想基础。

毛主席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响应的。”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要恢复自己的反动统治,总感到力量不足,于是把一只手伸向古代,一只手伸向外国,向古代和国际的反动派乞求援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凡是卖国,就必然要尊孔。这是一条阶级斗争的规律。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都是如此。林彪反党集团也是这样。一方面,林彪为了实现篡党篡政的反革命政治野心,积极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企图引狼入室,把社会主义中国变为苏修殖民地,借国际的反动力量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早已望风披靡,败下阵去,于是林彪一伙只能到奴隶主、地主阶级的武库中去借用早已腐烂发臭的思想工具,作为同无产阶级相对抗的武器。在那个见不得人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中,他们不是一方面图谋借助苏修“核保护伞”实现反革命阴谋,一方面又祭起孔子的亡灵,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武器吗?你看,尊孔和卖国,古代的亡灵和现代的洋鬼子,就这样和谐地在林彪身上结合、统一起来了。

帝国主义在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对旧中国实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过使用反动的文化思想毒素来麻醉中国人民。帝修反之所以选中孔子这块“砖头”,并不是因为特别喜爱孔子的儒家学说,而是因为,孔子的学说能够适应他们侵略和颠覆的需要。比如孔子站在反动奴隶主立场,提出“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苏修就如获至宝,说什么在孔子的时代因“亲族互相尊敬和兄弟般的团结,在斗争中被抛弃了,起而代之的是残杀和收买,敲诈和变节,仇恨和残暴”;而“克己复礼”这一类主张,就是“孔子提出的某种能够与现存观点相对抗的新观点”。很清楚,苏修就是要用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同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运动“相对抗”,同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学说“相对抗”,来“复”帝国主义之“礼”,即稳定帝国主义统治的秩序,要中国倒退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去。而那个把“克己复礼”说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也就被看作是“健康力量”了。苏修还极力吹捧孔子的所谓“仁政”,说什么:“根据孔夫子的学说,统治者也有责任关心人民,同时在管理他们时,不要靠暴力,而要用德行示范,不要基于法律和惩罚,而要凭借德政。”又说什么:“他(孔子)提出了这一论点,仁的本质在

于‘真正同情’别人，即承认别人同样是人，并积极地与别人共同担当所发生的一切。这是第一次号召要把任何人都看成人。”借此大肆贩卖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革命暴力。他们那样赏识孔孟的反动哲学，从历史故纸堆中去拣破烂，目的就是为掩饰他们侵略和颠覆的真实面目，为他们的帝国主义行径披上一层薄薄的理论外衣。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出国内外反动派神圣同盟异曲同工的尊孔丑恶表演。但是，孔子这块砖头没有能够帮助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也没有能够帮助帝修反敲开中国的大门。相反，他们却看到了剥削阶级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观念，现在在社会主义中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他们寄以希望的反革命复辟的思想基础在亿万人民中被搞臭了，当然要气急败坏，悲痛欲绝，歇斯底里大发作了。他们发出尊孔的疯狂呐喊，这是失败的哀鸣，又是惨遭没顶时的呼叫和挣扎，妄图为已被打倒的刘少奇、林彪招魂。

应该看到，当前，帝修反搞“尊孔反法”是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两千四百年前的孔子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奴隶社会的旧制度和旧秩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中，孔子反对变革，要求复古，反对前进，要求倒退，顽固地维护腐朽没落的奴隶制。他的反革命企图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了。两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世界是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帝修反是濒临灭亡的反动势力，他们内外交困，日益孤立，正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绝望境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孔老二所处的具体时代虽然不同，但都是处于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代。他们反对变革，要求倒退、复辟的阶级愿望和心理状态则是一致的。帝修反之大搞尊孔，无非是利用这具亡灵来为他们今日的卑鄙行为辩护。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一切革命的阶级都是批孔的，一切反动阶级都是尊孔的。帝修反的尊孔，完全是为了维护他们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妄图使时代车轮倒转，阻止人民革命的历史潮流。召唤历史的亡灵，是为了倒转时代的车轮。

帝修反的尊孔丑剧从反面启示我们：反孔与尊孔的斗争，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在国内进行，而且在国际斗争的舞台上展开。我们坚决批孔，就是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揭露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阴谋，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战斗。我们一定要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战斗，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孔子和儒家之徒是 一小撮政治骗子

康 立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类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如果我们穷根究底的话，在中国，他们的祖师爷应该推孔老二。研究孔老二这个历史上的骗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

大凡政治骗子，总有一套骗术。他们在骗人时都道貌岸然，信誓旦旦，装得一本正经。孔子和儒家之徒，明明是一批说假话的专家。但是在嘴上挂着的，或者在公开文书中写着的，总是一个“信”字。一部《论语》中，讲到“信”的地方有三十八次之多，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什么“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啊，说来说去，无非是表示他们的说话是算数的。有一次，孔子由于经常言行不一而遭到了他的学生们的怀疑，他竟当着许多人的面，捶胸顿足，罚神赌咒，对天明誓说：“你们这些小子，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论语·述而》）其实，孔丘此人，历来是极不老实的。他公开宣称：做父亲的偷了羊，做儿子的应当替他隐瞒。反之，儿子犯了罪，父亲也应当替他隐瞒。这就是真正的“正直”。（《论语·子路》）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的逻辑吗？

孔子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把说假话，耍两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诀窍。他的学生中有个叫子贡的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可算“士”？孔子回答：只有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忠臣、孝子才可称为“士”。至于“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说到做到，那只不过是鄙贱而又固执的“小人”罢了，根本不配当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谋臣。（《论语·子路》）总之，不骗人，就成不了“君子”，当不了野心家。他还公开鼓吹人心隔肚皮，说：“可以同他一起求学的人，未必能和他走同一条道路；能和他走同一条路的人，未必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让他

知道内情，参与机谋。”（《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即使是同党也不能信任，必须各自心怀鬼胎，尔虞我诈，即所谓“见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深得孔门心传的孟子，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政治骗术，厚颜无耻地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这就是说，凡是大人物，说话不一定要兑现，行动不一定要做到。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这套骗术揣摩备至，心领神会。他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收辑在精心编纂的《四书集句》内，奉为圭臬，并且赤裸裸地宣扬：“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由此可见，这伙政治骗子是依靠说谎混日子的。他们不说谎，就一天也混不下去。

在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跖曾经当面斥责孔子是“巧伪人”。“巧伪人”者，政治骗子之别名也。这种“巧伪”的特点，是由孔子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孔子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派，一生鼓吹的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他所玩弄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骗术，归根到底，是服从于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孔子要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不得人心的。他周游列国，到处受逐，活象一条丧家之犬，只能靠政治欺骗混日子。但既要骗人，就难免不露出马脚。因此，他经常言行相违，处于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女做妻子，按照儒家的学说是符合“礼”规定的。但孔子为了庇护国君的声誉以维持奴隶制的统治秩序，硬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强词夺理地说鲁昭公是知“礼”的君子。（《论语·述而》）理由呢？“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明明是违犯了“礼”，却偏要说成是合于“礼”，还要说这样做的本身就是“礼”的组成部分。所谓“礼”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很可以一目了然的。

在孔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形象。他表面上说什么“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没有官做，就怕不懂得“礼”，不能自立于世）（《论语·里仁》），又说是什么“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装得十分清高；实际上三个月没有官做，便急得不得了，发牢骚说：“我又不是葫芦，怎么能挂起来图好看而不吃饭呢？”（《论语·阳货》）他口口声声说什么“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事实上，他培植和训练了一批死党，形成了一个以复辟奴隶制为宗旨的小集团，对于这个集团里的人，稍不合己意，就立刻满脸杀气地叫嚣：“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口头上唱的是“仁者爱人”的高调，说什么“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可是，他上台不到七天，就把主张革新的少正卯给杀掉了。鲁迅对于孔子和孔子之徒的这种两面派行为曾辛辣地指出：“‘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

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鲁迅全集·病后杂谈》）

孔子不仅在政治上善于耍弄两面派手法，生活上也是一个极端虚伪而又无耻的家伙。孔子不是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的吗？但孔子当他的老娘死掉以后，身上还在披麻带孝，一听到季氏家举行宴会，立刻急急忙忙赶去赴宴，结果被季家的执事阳虎赶了出去，说：“我们老爷请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你穷小子的份儿！”（《史记·孔子世家》）一顿臭骂给轰出门去。孔子不是强调什么“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吗？可是他到卫国以后，由于求官心切，却偷偷走后门见了卫国国君的夫人南子，一进门就赶忙俯伏在地，连大气也不敢出，这副丑态见了实在教人难受，连他的学生子路也对他老大不高兴。当时孔子只能象江湖上卖膏药的那样对天罚誓：“我如果有不正之心，雷轰电劈”（《论语·雍也》）。孔子在口头上不是讲什么“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的吗？可是他在担任鲁国司寇的时候，年俸高达六万斗粟。衣、食、住、行，都十分讲究。论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盘子里的肉片要切得薄薄的。论穿，黑色的衣服要配紫羔皮，白色的衣服配麂皮，黄色的衣服配狐皮，过的完全是奴隶主贵族的糜烂生活。明代的李卓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生活这么豪华，说“圣人”不要富贵是骗人的。章太炎也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这是很能刻划出孔子的伪君子的残忍而又阴险的嘴脸来的。事隔两千多年，以现代中国孔夫子自命的林彪也在亦步亦趋地向孔子学习，鼓吹什么：“三保——保产、保官、保命”，“千里做官，为了吃穿”。林彪的这两句话，是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也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一切政治骗子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孔子是政治骗子。儒家之徒在反动孔学的熏陶下，学得了一身虚伪而又阴险的好本领，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

汉初的儒生叔孙通，就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政客。他曾经是秦二世博士，又当过项羽的食客，最后投奔了刘邦。他一生换了许多主子，因他善于察颜观色，奉承拍马，结果“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开始的时候，叔孙通的学生见他的老师这样地厚颜无耻，都有点瞧不起他，但最后由于叔孙通帮助刘邦制礼作乐，使他的学生都谋得了“郎”的官职。于是他的学生们一片欢声，心悦诚服地欢呼：“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传》）。可见，这是一群醉心利禄的无耻之徒。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也是一个儒生，并且是汉代第一个位至丞相的儒生。他的秘诀是在朝廷上“多磕头，少说话”。有一次，他与汲黯等公卿商量好到汉武帝前去奏事，结果他一见汉武帝不赞同，立即背叛前约来顺从汉武帝的旨意，气得憨直的汲黯骂他是“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史记·汲黯传》）。

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是法家的政策。汉高祖不信儒。文帝、景帝实际上信奉的都是法家的一套。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黯传》）这实际上就是批评汉武帝尊儒反法，做得不对。其实，汉武帝对法家倒是并不嫉视的，他所任用的官吏如桑弘羊等，大都是奉行法家主张的。这种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汉武帝以后，儒家在朝廷中的地位确实得到了抬高，儒生当大官的越来越多，官场风气也越来越虚伪腐败。汉宣帝时有个儒生叫陈万年的，就极善于奉承拍马，讨得了丞相丙吉的欢心，做到了御史大夫的高官。他生病的时候，要他的儿子陈咸在床边听他的训话，絮絮叨叨地一直讲到半夜。陈咸越听越烦，越听越倦，最后不禁打起瞌睡来了，一头撞着屏风，头上起了个疙瘩。这一下，陈万年恼火极了，要举起棍子打他，说：“老子苦心教训你，你反而打瞌睡，不听我的话，是何道理？”陈咸回答说：“大人说的，儿子都听明白了，不过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罢了。”（《汉书·陈万年传》）这几句话，倒是颇为淋漓尽致地说破了所谓儒生、儒吏们的真面目。

在西汉的统治者中，真正信奉儒家学说的是汉元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一再劝他的父亲汉宣帝要任用儒生，结果挨了汉宣帝的一顿批评，汉宣帝叹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事实也确如汉宣帝所说的那样，元帝是个既愚蠢而又死要面子的皇帝。他的老师肖望之是个有名的儒学大师，元帝对他推崇备至，一即位就下诏说：“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汉书·元帝纪》）。当时，宦官弘恭、石显与肖望之有矛盾，就奏告元帝说：“肖望之为臣不忠，应当召致廷尉”。“召致廷尉”是进监狱的别称，元帝根本不懂得这层意思，却不懂装懂，稀里糊涂地批准了这道奏章。后来汉元帝发现肖望之进了监狱，不禁大吃一惊。要宣布肖望之无罪吧，等于承认自己无故处罚老师的罪名，面子上下不来。特别是弘恭、石显两个人，提出了儒家的“为君者讳耻”的原则，竭力反对肖望之官复原职。汉元帝只得打肿脸充胖子，将错就错，索性把肖望之的撤职罢官。后来，元帝一面说要尊师重道，准备任用肖望之为宰相，一面却又听信弘恭、石显的主意，把肖望之又一次关进监狱。肖望之老泪纵横，仰天长叹，服毒自杀了。汉元帝得知后，哭了一场，骂弘恭、石显说：“果然杀吾贤傅！”（《汉书·肖望之传》）其实，汉元帝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凶手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所信奉的孔孟之道。肖望之死得也是活该，谁叫他用儒家的理论来培养与熏陶汉元帝的呢？结果呢，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汉元帝用肖望之教他的这套

孔学来对待肖望之，肖望之就受不住了，只得到阴间去找孔圣人诉冤去了。

西汉的政治以汉元帝为转折点，此后一直走下坡路。《汉书》的作者班固评论汉元帝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汉书·元帝纪》）。这话是有道理的。凡是尊奉儒家的，总是讲究繁文缛节，搞形式主义的一套。汉宣帝是不信儒的，他骂儒家之徒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元帝一反宣帝的行事，尊儒反法，结果汉朝的政治越搞越糟糕，元、成、哀、平四朝，一代不如一代。尊儒的结果，是西汉的灭亡。

在两汉，由于封建统治者提倡孔学，尊儒反法，读经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知识分子中的风尚极其虚伪、腐败。西汉时有个儒生叫许武的，在他自己被举为孝廉后，和两个兄弟串通，演出了假分家的丑剧，要他的两个弟弟假装“让产”，使他们获取美名，也得被举为孝廉。最后，许武又大会宾客，宣布自己为使两弟成名而有意蒙受贪财的恶名的苦心，从而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名声。《今古奇观》有一则《三孝廉让产得高名》的故事，就是根据这桩事实铺陈叙述而来的。从这桩被地主阶级引为美谈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所谓儒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政治骗子，为了向上爬，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又如东汉赵宣葬父母，在墓道中居住达二十多年之久，名震遐迩，成为轰动一时的大孝子。朝廷屡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却坚持在墓道中守孝，孝名愈来愈大。后来一查，他在墓道中连续生了五个儿子，这一下骗局方才被揭穿。鲁迅说得好：“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鲁迅全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汉代的劳动人民，对儒生这种虚伪无耻的行为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当时有首民谣说：“举秀才，不读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人民群众的眼中，以清流自居的儒生却是浊如泥的。其实，就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进步思想家，也瞧不惯儒家之徒这种虚伪无耻、掩耳盗铃的欺世行径。在西汉，法家桑弘羊批判儒生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针对汉代的社会风尚指出：“俗儒守文，多失其实”。王符在《潜夫论》中批评汉代儒者是“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两面派、政治骗子。到了汉朝末年，信奉法家的曹操对这批虚伪无耻的儒士深恶痛绝，一再表示“吾欲整齐风俗”，对汉代儒生的歪风邪气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地主阶级的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孔子在思

想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宋代,出现了以“伪学”著称的道学。程颢、程颐 and 朱熹等人把孔孟之道发展成为程朱理学,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特别是朱熹,他编纂了《四书集注》、《通鉴纲目》来对孔学进行发挥,影响极大,流毒甚广,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就是这个朱熹,由于深得孔学真传,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为了泄私愤,对无告的官妓严刑敲打,阴谋搞政治陷害。他平时口口声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就用粗绳大索把孔子塑像捆绑起来搬徙,结果把孔子的手脚也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他口口声声“百行孝为先”,但虐待老母,自己吃好米,给他的母亲吃发霉的米。其实,道学家都是一批寡廉鲜耻的伪君子、真小人,又岂仅是朱熹而已!元朝一建立,南宋的那批道学家纷纷卖身投靠,比谁都要积极。因此,元朝也是崇儒的,官方修的宋史就列了专门的章节来给宋代的道学家树碑立传。明代的李贽曾经辛辣地讽刺道学家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与然。”(李卓吾:《初潭集》卷四)李贽本人是从儒家营垒中杀出来的,对其中的黑幕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他直率地指斥这批道学家的行为简直同猪狗一样。其实,李贽把猪狗是看低了,猪狗都是有用的家畜,这批道学家是根本不配和它们相比的。

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伪君子的虚伪行径,反映了没落阶级处于没落境地中所采取的垂死挣扎的手法。因此,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要搞复辟、开倒车,就都要尊孔学、学孔学,向孔子这个政治骗子的祖师爷顶礼膜拜。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全盘继承了从孔孟到朱熹的骗人衣钵,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亲自编纂了《四书集句》,抄录背诵,身体力行。他还公然标榜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长期以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却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它集中地表现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对于一切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无论是孔子还是林彪,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今天,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我们彻底批判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行为,可以增强我们识别林彪之流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能力,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反孔运动

黄彦

(一)

十九世纪中叶,汇聚在太平天国革命旗帜下的千百万农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了国内封建统治势力和国际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在思想战线上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气势磅礴的反孔运动,对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革命的扫荡。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直接继承了历代封建帝王尊孔崇圣的衣钵。顺治帝给孔子加封了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乾隆进一步将孔子从“圣人”升格为“天纵圣神”,说孔子“乃天之经,地之义,山之峙,海之渊,无日不在人心目中,范围曲成而不遗。”^①其实,封建统治者把孔子神圣化,目的是为了使其封建统治神圣化;而用灵光圈装饰起来的儒家学说,却也成为护卫封建制度的灵光圈。中国的封建社会自乾隆以后日趋没落,就如《红楼梦》中所说的那样,外面架子虽没有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各地农民的自发斗争风起云涌。清朝统治集团为着挽救濒临崩溃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愈加利用孔孟之道及其发展形态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愈加“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借以强化地主阶级专政。

但是,跟统治者的愿望适得其反。英国侵略者的炮声惊醒了不少先进的中国人。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一八四三年,洪秀全用农民革命的思想对西方基督教义加以改造,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与此同时,洪秀全在他担任教师的村塾中,毅然砸毁了孔子的牌位。这个破天荒的激烈举动是太平天国反孔运动的先声,是投向整个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第一道挑战书。在洪秀全的带动下,另一个农民出身的塾师洪仁玕也把孔子的牌位扔掉。他们的革命行动招致村中封建势力的横暴干涉,被迫失去教席。但是洪秀全不怕孤立,不怕迫害,不怕失业,勇敢地顶住了那股泛滥两千年的强大的尊孔潮流。他昂然走出了本村的小天地,到外地从事革命的发动工作。

毛主席告诉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洪秀全除了致力于理论著述外,精心构拟了一个神话故事,作为对劳动群众进行政治鼓动的宣传品。洪秀全在这个神话里谴责孔子“变妖惑人”,是“奸心”帮助“妖魔头”(影射清朝皇帝)的元凶,并且寓意深刻地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

错。”他还讥笑孔丘是个“不通秀才”，每次考试都只得个“四等”。神话中还安排了这样有趣的斗争场面：孔丘在天上遭到天父、天兄、众天使和洪秀全等的轮流批判，他“始则强辩”，接着“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被洪秀全等追捕绑解回来，天使对孔丘“鞭挞甚多”，他跪下“再三讨饶”，“哀求不已”；最后，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丘被送到了天上的菜园里劳动。^②

请看，农民群众千百年来积抑着的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满腔仇恨怒火，通过嘲讽、声讨和鞭挞孔子这个封建思想权威而迸发出来，这该是多么痛快啊！在这里，非现实的形式鲜明地反映着现实的斗争，天上壁垒分明的神与妖、正与邪之间的对立，恰恰是地上敌对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的投影。“圣神”孔子竟被描绘成亡命无赖般的猥琐形象，这在以往历史上还是从未曾有过的。这个神话包含着深刻的革命道理，它既然把封建帝王对之顶礼膜拜的“圣神”都可践踏在地，那末，大大小小的封建主的神圣性同时也就被剥夺殆尽了。

一八五一年一月，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后，数年间就迅速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洪秀全的倒孔叛经思想成为在革命高潮中起义者们普遍接受的行动信条，而武装斗争的高涨则为反孔运动取得广阔的群众规模开拓了道路。向各省蔓延的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焰，变成了孔子及其一切附属物的火葬场：太平军所到之处，举凡崇奉孔子的庙宇、学宫、偶像、牌位和儒家典籍，大都尽行焚毁（也有将学宫改作马厩、屠宰场的）。这样，出现了一个“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③的群众性反孔热潮，地主士绅闻风丧胆，劳苦农民拍手称快。太平天国特别把儒家典籍列为严厉取缔的重点，“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④。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今南京）后还颁布过刑律，明文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⑤，并下令严禁考场试题取材于四书五经，违者以“变妖”论处。

凡是革命，都是暴烈的行动。在中国，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象四条绳索紧紧地捆绑住了农民的手足，不经过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反孔行动和措施，就无法斩断这些绳索。正由于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把孔学这具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砸得粉碎，推动了革命的迅猛发展。太平军所到之处，杀逐官吏豪绅，捣毁官府衙门，焚烧祠堂庙宇，夺取地主土地，焚毁田契债券，给予地主阶级和整个封建制度以格外沉重的打击。

有革命必有反动。清朝统治者面对着太平天国声势浩大的批孔斗争，十分惊慌，由皇帝咸丰出面主演尊孔祀圣的闹剧，下诏发出“崇儒重道”的叫嚷，并亲自向百官宣讲《四书》。大刽子手曾国藩在他发布的反革命檄文中，捶胸顿足地号啕：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他竭力鼓动那些顽固地坚持尊孔立场的“抱道君子”，要“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要为着“慰孔孟人伦之隐痛”而参加他的反革命武装——湘军^⑥。在湘军所能到达的地方，曾国藩重新修缮孔庙和学宫，把被革命农民打倒的孔子偶像重新扶起来，设局重刻儒家典籍，大肆贩卖孔孟之道。他还在“卫道”的名义下，鼓吹“借洋兵助剿”，无耻地声称要以“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为指导去勾结外国侵略者^⑦，促成中外反动势力合流绞杀革命。这一切表明，当时尖锐激烈的反孔与尊孔之争，乃是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

垒、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殊死搏斗的表现。

(二)

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把孔孟经籍尊崇为“圣典”，把孔孟学说敬奉为“圣道”，对于它的任何亵渎都是不容许的，一有背离，就可能招致杀身灭族之祸。而洪秀全却将儒籍孔学一概斥之为“诱惑人心、紊乱真道”的妖书邪说，把封建社会种种罪恶的思想根由归结到孔子学说上面。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洪秀全对儒家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忠君说进行批判，论证了农民造皇帝的反的合理性。

历代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宋以后的理学家，继承了孔子的“臣事君以忠”一类奴隶主的道德教条和唯心主义的天命论，鼓吹君王“受命于天”。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咸丰帝亲自出马，说什么：“君人者，代天司牧斯民。”^⑧曾国藩也鼓吹：“三纲之道，君为臣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⑨洪秀全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天父上帝人人共”，普天下人都是上帝的“赤子”，“何得君王私自专”呢^⑩？！洪秀全又认为：历代君王受命的那个“天”，不过是一伙邪神妖魔或人造的“木石坭团纸画”的偶像，是荒诞虚妄的。他把秦汉以来历代的封建帝王统统斥责为“犯反天之罪”的“阎罗妖”，而那个当代的“阎罗妖”则是上帝所要求“共击灭之惟恐不速”的对象^⑪。

第二，洪秀全对儒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正名”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平等的主张。

孔子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严守“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并且发出了“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的叫嚣。后世封建统治阶级也都用三纲五常来维护等级森严的贵贱尊卑关系。当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兴起后，曾国藩狂呼：“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⑫而洪秀全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思想。他满怀激情地大声疾呼：“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⑬“兄弟姊妹，皆是同胞，……何分尔我，何分异同！”^⑭在洪秀全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政权，农民可以考中状元，工匠被称作“大人”，妇女也和男子一样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而对于地主老财，则严加打击和镇压，有的地区并强制他们服劳役。

第三，洪秀全对儒家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之道”进行了批判。

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愤慨地揭露了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下，“农工作苦，岁受其殃”^⑮、“饿莩流离，暴露如莽”^⑯的悲惨境遇，谴责了那由于“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而造成“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吃人社会的黑暗现状^⑰。他号召建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提出“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帝”，“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⑱。这种理想的提出，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地主剥削的合法性，否定了贫富不均的合理性。洪秀全指出，革命的奋斗目标便是要在地上建立起“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天国，来代替眼前这个“乖漓浇薄”、“陵夺斗杀”的邪恶世界^⑲。

综上所述，可知洪秀全批判孔孟之道的精神武器，是朴素的、闪烁着战斗光芒的平等

思想；这种思想虽被赋予一种神学异端的外观，却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当时广大农民要求从封建桎梏下面获得翻身解放的迫切愿望的理论表现。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而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反孔思潮同曾国藩为代表的尊孔思潮的对立，实质上就是农民和地主这两个阶级之间，反对或者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主张或者对抗用革命暴力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走狗——清朝封建统治的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

*

*

在中外反动统治者的联合镇压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但是，这个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反孔运动也同样地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这场伟大的思想斗争告诉我们：孔学在中国，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武器，是一副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不对孔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是发动不起来的；而每一次革命运动的结果，又都必然地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孔学。在中国，反动的孔学与帝国主义文化结成了同盟，是一对亲热的好兄弟。由于阶级的历史的条件的限制，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不能完成彻底摧毁反动的孔学的任务。资产阶级更是没有打上几个回合，就丢盔卸甲地败下阵来，甚至由反对而转向合流。彻底批判孔学的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尊孔派。今天的帝修反也都是尊孔派，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更是没有一个不尊孔的。归根到底，对待反动的孔学的态度，实质上也就是对待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一切反动的阶级要维护孔学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而一切革命的阶级则都要打倒孔学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尊孔派。他俨然以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自居，把孔子的“克己复礼”当作座右铭，以此来勉励自己坚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决心，叫嚣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把复辟资本主义看成是万事中的大事，就象孔子把复辟西周的奴隶制度看成是万事中的大事一样。孔子和林彪，都是没落阶级的代表，他们穿一条连裆裤。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深入批林批孔，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开火，把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注：

- | | |
|---------------------------------------|-----------------------|
| ① 《御制热河文庙碑记》 | ⑨ 曾国藩：《谕曾纪泽书》 |
| ② 参看《太平天日》；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樗国退叟：《盾鼻随闻录》等 | ⑩ 洪秀全：《原道救世歌》 |
| ③ 山曲寄人：《题壁：禁孔孟书》 | ⑪ 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
| ④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 | ⑬⑭⑯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
| ⑤ 张德坚：《贼情汇纂·伪文告》 | ⑭ 《天情道理书》 |
| ⑥⑫ 曾国藩：《讨粤匪檄》 | ⑮ 杨秀清、萧朝贵：《诰谕四民各安常业》 |
| ⑦ 曾国藩：《复李少荃书》 | ⑯ 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敬布四方谕》 |
| ⑧ 《东华续录·咸丰朝》 | ⑰ 《天朝田亩制度》 |

哲学上的“倒过来”和 政治上的“开倒车”

——批判林彪、孔子的“正名”说

仲 澜 延 风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念念不忘“要当国家的头”，声称“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这句“名不正言不顺”，正是两千多年前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家孔子的反动说教。林彪从孔学秕糠中检出这个破烂作为自己反党政治纲领的根据，决不是偶然的。林彪与孔子都是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他们都妄图用“正名”说这种“倒过来”的哲学来为他们政治上“开倒车”制造理论根据。

孔子的“正名”说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别人问孔子搞政治首先应当抓什么时，孔子直截了当地回答：“必须正名！”孔子把“正名”作为搞政治的首要任务，完全是针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局面提出来的。孔子认为，奴隶制的崩溃是由于当时的“实”违反了西周奴隶制度的等级名分（即“名”）所造成的；要实现他所梦寐以求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关键在于“正名”。孔子说：名不正，说起话来就不妥当合理；说话不妥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那套西周的礼乐和典章制度就不能维持下去；这套制度维持不下去，治国的刑罚也就不能有效执行，老百姓就要乱说乱动了。这就表明，在孔子看来，奴隶制社会的那套礼乐、刑罚、典章、制度等上层建筑并不是奴隶制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些事物的名称概念也不是这些事物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而倒是由“名”决定了礼乐、刑罚、典章、制度，决定了奴隶制国家的一切。这样，一切客观事物竟都成了“名”的派生物。

究竟是“名”决定了“实”，还是“实”决定了“名”，即是概念决定事实，还是事实决定概念，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认识路线。正如恩格斯在批判江湖骗子杜林关于原则在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后的谬论时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实”）是第一性的，概念（“名”）即

人们的认识是第二性的，“实”是世界的本原，“名”是“实”的反映，离开了“实”也就谈不上“名”。孔子把“名”看成是第一性的，决定其它一切事物的，把“实”看成是第二性的，这是头足倒置的主观唯心论，是一种“倒过来”的哲学。

在唯物论反映论者看来，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反映客观事物的“名”也应当随着“实”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但是，那些主张“正名”说的人则不然。他们认为“实”是“名”的派生物，因而总是拿一成不变的“名”来衡量不断发展变化的“实”，也就是用旧事物、旧制度的“名”来纠正新事物、新制度。在政治上就必然表现为倒行逆施，反对革新，主张复古，反对前进，主张倒退。孔子“正名”说的中心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要象个君，臣要象个臣，父要象个父，子要象个子，这一切都不能乱，不能动。原来，在孔子提出“正名”之时，“文武周公之道”和一整套的西周奴隶制的礼乐制度不行时了，有的奴隶主国君已经空有其名，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而有的新兴的地主阶级，即原来的“臣”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措施，渐渐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臣杀君、子杀父的事也逐渐多起来，奴隶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一切，使孔子大为恼火，他叫嚷“正名”，就是要君臣父子各安本份，做臣子的不准造君主的反，做奴隶的不准造奴隶主的反，妄图恢复过去那种“郁郁乎文哉”的奴隶主统治的老样子。

正是孔子的这种从主观到客观的“倒过来”的哲学，把是非黑白都弄颠倒了。他领着他的学生坐着马车，风尘仆仆，周游列国，到处宣传“信而好古”的思想，把腐朽没落的奴隶制度吹得尽善尽美，天花乱坠，把新兴的封建制度说得漆黑一团，一切都是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当时郑国的民歌新兴起来，孔子咒骂这种民歌为“淫声”，指责说：这种“下里巴人”的歌也配拿出来！还给它加上了破坏典雅乐曲的“罪名”。（《论语·阳货》）甚至连当时的酒器形状的改变，他都要拿来借题发挥，大骂一通：“觚不象个觚，这也是觚吗？这也是觚吗？！”（《论语·雍也》）借以发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心头之恨。在新生事物面前，他们是聋子、瞎子。他们用旧眼光、旧尺子来衡量新事物，这也看不顺眼，那也不合“规矩”，这是“四不象”，那是“三脚猫”，简直是一无是处，一塌糊涂，恨不得马上把它们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这只能是抱残守缺的绝望哀鸣，又怎能阻挡住事物的新陈代谢和人民群众日新月异的革命创造呢？历史这样无情地嘲弄了那些用“倒过来”哲学在政治上开倒车的顽固派们！

围绕着名、实问题的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总是反映着革新和倒退、革命和复辟的斗争。地主阶级在其尚未取得政权的时候，出于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需要，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因而批判孔子的“正名”说，认为“名”是由“实”来规定的，“制名以指实”，人们的观念应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名闻而实喻”，人们的观念同实际相符合，才是正确的认识。（《荀子·正名》）主张以“名”符“实”，反对以“实”符“名”。地主阶级随着地位的转化，由主张社会变革，转为反对任何变革，也就由批判孔子的“正名”说，转为继承这种“倒过来”的哲学。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他继承孔子的“正名”说，并把它同孔子的“天命”论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以名正实的“倒过来”的哲学。董仲舒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名号之正，取之天

地”(《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不是事物决定概念,而是概念决定事物,名不是反映事物,而是表达天意的。他又把“名”说成是天通过圣人给事物命名的,圣人根据天意所制定的“名”,是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神圣不可动摇的标准,因而封建统治者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这种以名正实、帝王即天的反动理论,又被后来的朱熹进一步继承和发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根据。朱熹认为,宇宙万物和封建秩序都是先于事物存在的“理”决定的,“三纲五常”是永恒不变的“天理”,“君臣父子,定位不移,事之常也”。(《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这就把封建地主阶级的等级名分“三纲五常”说成是“变不得”的“天理”,反对任何政治上的革新和进步。

林彪声称“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奉行的也是孔子那套以名正实的“倒过来”的哲学。为什么他们都对“名”那么津津乐道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名”后面有“权”。孔子认为,有“名”才能有权。孔子的“正名”,说穿了就是要夺回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失去的权力。林彪也是看中了“名”后边的权,他认为有了“名”,就有了权;有了权,就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有了这两个“一切”,就可以实现他的“唯此、唯此为大”的“大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他拚命地要当“国家的头”,迫不及待地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林彪的这种有“名”就有一切,同孔子的“名”派生一切,完全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唯心论的“倒过来”的哲学。他不是多次直言不讳地供认“办事情的过程”是“从主观到客观”这种“倒过来”哲学吗?他拚命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把自己打扮成“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并且公然宣称他和他的死党都是“受于天”,也就是说他当“国家的头”的“名号”,是“受命于天”的。这同董仲舒鼓吹的“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实在是一模一样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的这段论述,不正是对林彪和孔孟之徒的“倒过来”哲学最有力的批判吗?

林彪搞“倒过来”的反动哲学,同孔子一样,也是为了开历史的倒车。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了旧世界的污泥浊水,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林彪代表着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极端仇恨,他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礼崩乐坏”局面,疯狂叫嚣要“克己复礼”。在林彪一伙眼中,新中国的一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新生事物,都不符合他的“礼”,都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千方百计地要复辟旧制度,把历史拉向后退。“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继承孔子的衣钵,想“从主观到客观”倒行逆施地搞“正名”,搞复辟,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这就是一切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的必然下场。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杨 敏 丑 宗 廷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这是鲁迅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不论是头上插着好看的旗帜的“正人君子”，还是专门贩卖“毒害革命的甜药”的江湖骗子；不论是“蒙着公正的皮”的叭儿狗，还是鼻梁上搽着白粉的“摩登圣人”，经过鲁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一比较，都无可奈何地露出他们的“鬼脸”。

叛徒杨邨人在投降敌人、做了特务后，还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招摇撞骗。鲁迅把杨的前后言行拿来对比，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指出：“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更其阔。”国共合作时是“阔人”的杨邨人，到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仍然是“阔人”，但这“阔人”的头衔是用革命者的血换来的。寥寥数语，叛徒杨邨人的嘴脸毕现纸上！

学习鲁迅的比较法，我们同样来分析一下林彪的前后言行，对照他对待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待修正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态度，就能清楚地看出林彪的庐山真面目。例如，林彪反对学习马列的“理由”之一是马列离我们“太远”。乍一看，他好象十分“厚今薄古”。但是，孔老二死了已经二千四百五十多年了，离我们倒确实“太远”了，可是他对这个孔老二所宣扬的关于“天才”的观点，却发誓“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对于孔老二反动谬论的核心“仁”，赌咒说即便“杀身”，也要去“成仁”。距今几千年之遥的剥削阶级反动思想不嫌其远，而拚命要身体力行之；刚刚出现一百多年的马列主义理论就说“太远”了，要取消学习。一比较，林彪的反动面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林彪反对学习马列的另一“理由”是马列太“洋”。猛一听，他似乎是不迷信洋人的。他说，马、恩、列、斯都是“洋人”，“不要迷信洋人，不要认为洋人的书就是理论”。可是他对“洋人”“迷信”的例子却俯拾皆是。他对“东洋”日本的“江田岛精神”，却“迷信”到顶礼膜拜的程度，非要叫他的死党至死发扬不可。而他对“西洋”苏修的“洋伞”——“核保护伞”，则更是当作救苦救难的救命草。至于说到既“洋”又“远”、距今二千二百多年的古希腊“洋人”柏拉图的“理论”，林彪却把它捧到天上，奉为“世界国家学说的一种基础”。另外，既然林彪嫌马列又“远”又“洋”，狂叫不要学，不必学，可是为什么又在自己脖子上挂上“志壮坚信马列”的牌子呢？可见所谓“坚信”乃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这样一比较，林彪反对学习

（下转 55 页）

“独往独来”析

石望江

前几年，读到过林彪“谈写作”的一份东西。林彪说，他一贯来对于词句的收集非常下功夫，每见到一个“好词汇”，“都是如获至宝，赶紧把它摘抄下来”。这些“至宝”究竟是些什么货色？现在是真相大白了。我们这儿仅举其一，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对这一条，林彪不仅亲笔手书，而且挂在床头正中墙上，以便朝夕诵念，可见是“宝中之宝”了。

八个字中，有两个“独”字。“独”，正是它的核心所在。

历来的反动派在人民中间总是孤独的。孔夫子虽然号称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但人民群众并不买他的账，公开骂他是“丧家之犬”。那些“贤人”和“弟子”总该和他一条心了吧？也不。当有人问他“弟子孰为好学”时，他不是只能讲出颜回一个人的名字吗？而这个颜回又是早夭，因此，他东奔西走的反革命活动，也只不过是“独往独来”的凄凉行程。二千多年来，他的后继者们虽然身份不同，经历各异，但“独往独来”的命运却谁也没有摆脱得了。由于思提出、而又被刘少奇、林彪一伙倍加推崇的所谓“慎独”，正说明他们永远孤独、代代孤独，以至不得不专门想法子来寻求孤家寡人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了。

他们为什么孤独？这是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人民群众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却利令智昏地去阻挡和抗拒，天天将“复礼”也即反革命复辟当作“唯此为大”的头等大事，那怎么会不被人民群众彻底抛弃呢？谁反动谁就孤立，越反动就越孤立，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诚然，革命者有时也会处于“孤立”的地位，但那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从本质上看问题，千百万革命群众站在他一边。同样的道理，尽管反动派有时也“威势烜赫，从者如云”，但那只是现象，并不能掩盖他们作为独夫民贼的本质。

林彪把“独往独来”比之以“天马行空”，以孤独为荣，以孤独自恃。在他看来，不孤独就不足以显出至尊至贵。所以，他竭力宣扬“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天才”和“群众”的分野。甚至公开宣称，与群众相比，“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自然，他是“天”，群众是“壤”。这里的用意很清楚：只有把自己打扮成“受之于天”的圣人，才能骗取镇压人民的权力。不制造这种虚假的精神光圈，一根孤零零的枯枝朽木，焉能与千百万人

民群众相抗衡？你看，奴隶主阶级思想家宣扬“独有之人，是为至贵”；历代封建帝王总是声称“国家兴亡，在余一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叫嚷什么“最孤立的人最有力量”；法西斯主义哲学家则崇拜孤独的“超人”，说什么“雄鹰决不结队飞翔，这种事应当让燕雀去干”……一句话，他们都把自己打扮成凌驾于群众之上、而又能主宰群众的至尊至贵者。林彪只不过亦步亦趋地继承了这种衣钵。

崇尚孤独，为的是独裁。董仲舒要把孔子和儒家学说“独尊”起来，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反革命独裁。林彪也是一样。他要“独往独来”，决不是想做飘零于山林野泽之间的隐士逸人，而是下决心与人民对抗到底。如果一旦阴谋得逞，必然要实行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专政。林彪不是多次宣扬要以“仁”、“忠恕”、“人和”的原则来处理相互关系吗？但既然要“独往独来”，还存在什么“相互关系”？显然是欺骗和蒙蔽人民的鬼话。一个“独”字，就清楚不过地说明即使在他们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内部，也都是各自“独立”、相互戒备、同床异梦的。因此，林彪敢掀起“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的“天马”来了。“天马行空”者，横行无忌之谓也。他是多么渴望自己能象想象中的“天马”一般恣意放纵、为所欲为，来尽情地蹂躏中国人民啊！

然而，事与愿违。既然反动派非把自己孤立 in 人民群众之外不可，那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遭受灭顶之灾的条件。请看中外历史上，有多少“唯我独尊”、“朕即国家”的反动独裁者，到头来都难逃覆灭的下场！有的只带了老婆躲在枯井里束手就擒，有的在一个太监的伴送下只身上吊，有的干脆被送上断头台……总之，以孤独而自尊者，又以孤独而自灭，这是一条颇有讽刺意味的规律。这一点在林彪身上表现得更为彻底。正当他要“辣手造乾坤”，妄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没料到早已被人民群众包围起来了。“舰队”沉没了，只好带着七零八落的几个人坐飞机逃跑。

这下子总算真的实现了他“天马行空”的宿愿，离开被他咒骂过多次的“群氓”和“野人”而飞升，又一次与群众有了“天壤之别”，显得非常飘逸和高超了。但正如鲁迅所说的，“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但“这高超仍不免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结果正是如此。

当然，林彪即使没有“从天上掉下来”，扑进了苏修的怀抱，那么，他和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一样，在苏联人民中间也必然是孤立的。“独在异乡为异客”，要组织“还乡团”来反攻倒算只是梦想。如若不信，就请看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另外两个叛徒、卖国贼——托洛茨基、王明逃亡国外以后的处境吧。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是无敌的。只有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才有移山倒海的力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广阔天地里纵横驰骋。那些蜷缩在蜗牛壳里与广大人民为敌的反动派，不管他们自视多高、“韬晦”多深、窃取的权力多大，终究是脆弱不堪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得不到“天马行空”的自由。面对着人民革命的洪波巨澜，他们“出入六合”而无翅，“游乎九州”而无足，最后必然以惨败而告终。孔子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



先秦思想家批孔言论辑录

一、法 家

商 鞅

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 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出身卫国贵族,姓公孙氏,名鞅,也叫卫鞅。他辅助秦孝公变法,因功封于商,所以又叫商鞅。《商君书》二十四篇,是后人辑录的,记述了他的学说。

反对“法古”、“循礼”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①不循②古而王,夏、殷③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④。

《史记·商君列传》

①汤、武:指建立商朝的成汤和建立西周的武王。

②循:遵循。

③夏、殷:夏朝、商朝。

④不足多:不值得称赞。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

三代①不同礼而王,五伯②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

《商君书·更法》

①三代:夏、商、周。

②五伯:伯,同霸。五霸一般指春秋时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批判儒家的“仁义”、“礼乐”

六虱①,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

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

《商君书·靳令》

①六虱：虱，咬人的虫。《商君书》把儒家的礼乐诗书等称为六虱。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商君书·农战》

提倡“不贵义而贵法”

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商君书·画策》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①。

《商君书·赏刑》

①三族：一般指父、母、妻三族。

荀 子

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公元前二三八年) 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著作留传下来的有《荀子》一书。

批判孔孟的“天命”论

天行有常①，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②。强本而节用③，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④，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⑤，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⑥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⑦，则天不能使之全。倍⑧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⑨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⑩，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荀子·天论》

①天行有常：自然界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

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意为以合理的行动去对待规律，就会收到好的效果；以错乱的行动去对待规律，就会遭到灾祸。

③强本而节用：发展农业生产而又节俭。

④养备而动时：养备，给养充备；动时，行动适时。

⑤脩道而不贰：脩，“循”字之误，遵循；贰，与“二”同，违背。意为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违背。

⑥袄：同妖。

⑦养略而动罕：养略，给养不充足；动罕，行动不积极。

⑧倍：同背，违背。

⑨薄：逼迫，侵袭。

⑩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意为乱世人们所遇到的天时和治世一样，然而遭到的灾祸却与治世不同。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①？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②？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③？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④？故错⑤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天论》

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意为与其把天看得很尊大而空想它，何不把天当作物来畜养并控制它？

②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意为与其听任物类自然生长而增多，何不充分发挥人的才能而使它发展呢？

③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意为与其空想役使万物，何不加以管理而不让浪费呢？

④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有，同佑，辅助、促使的意思。意为与其指望物类自然生长，何不掌握物类的生长规律而促使它成长？

⑤错：错，同措，放弃。

批判孔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

《荀子·荣辱》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①之所学也。吾尝跂②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③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④。

《荀子·劝学》

①须臾：片刻。

②跂：踮起脚尖。

③假：依靠。

④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意为君子并不是生下来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善于通过对事物的考察而获得知识罢了。

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①。人积耨耕②而为农夫，积斲削③而为工匠，积反货④

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⑤。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⑥。

《荀子·儒效》

①人之所积也：是由人积累学习的成果形成的。

②耨耕：锄草翻土。

③斲削：斲，同斫，砍的意思。砍削木材。

④反货：反，同贩。贩卖货物。

⑤都国之民安习其服：意为各国的人民安于其风土习俗。

⑥积靡使然：靡，同摩，磨炼、磨砺的意思。意为这是积习和磨炼使他们这样的。

批判孔子的“正名”说

名无固宜^①，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②。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③。

《荀子·正名》

①名无固宜：宜，合宜。意为事物的名称并不是永远合适的。

②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意为人们互相约定一个名称，约定后成为习惯了，就是合宜的，和约定名称不同的就说不合宜的。

③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意为一个名称并非本来就涵着固定不变的事物，由于人们约定用这一名称来命名这一实际事物，约定后成为习惯了，就说这只是这一实物的名称。

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荀子·正名》

反对儒家的“法先王”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①，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②，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③。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④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脊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⑤，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⑥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非十二子》

①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意为粗略地效法先王，然而又不知道其纲领。

②五行：即仁、义、礼、智、信。

③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意为这种学说不仅是没有系统的邪说，而且是偏僻难懂，无法解说。

④子思：孔子的孙子，相传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

⑤世俗之沟犹脊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沟犹脊儒，指愚昧无知的儒者。嚙嚙，喧嚣的意思。意为世上愚昧的腐儒也跟着乱叫一通而不知他们的错误。

⑥子游：孔子的学生。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②，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③；其衣冠行伪^④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⑤；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⑥足以揜其口^⑦，则扬扬^⑧如也；随其长子^⑨，事其便辟^⑩，举其上客^⑪，僂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⑫。

《荀子·儒效》

①逢衣浅带，解果其冠：意为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阔带子，戴着中间高而两旁低的帽子。

②一制度：建立一种统一的制度。

③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意为不知道把实践礼义放在首要地位，把记诵诗书放在次要地位。杀，相差一点。

④伪：同为。

⑤明不能别：虽然明显但不能辨别。

⑥委积：储蓄。

⑦揜其口：揜，掩。意为糊口。

⑧扬扬：得意的样子。

⑨随其长子：顺从显贵的人。

⑩事其便辟：侍奉显贵左右的亲信小人。

⑪举其上客：吹捧显贵者的上客。

⑫僂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僂然，安然；虏，奴隶。意为俗儒贪图衣食，对象终身奴隶般的生活处之安然，而不敢有其他的想法。

批判孟子的“性善”论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①也。

《荀子·性恶》

①伪：人为、作为的意思。荀子把不是天性而由人们后天作为的叫做“伪”，以与“性”相区别。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①。”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②。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之人性善，将皆丧失其性故也^③。”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

《荀子·性恶》

①人之学者，其性善：意为人之所以能够学好，是由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②事：造作。

③今之人性善，将皆丧失其性故也：意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之所以不好，大概是由于丧失了本性的缘故。

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朴，原始本质；资，固有资赋。大意为：人的本性如果生来就脱离它的原始本质，脱离它的固有资赋，那才一定是丧失了它的本性。（可是人性并不能脱离它固有的资质，好比听力视力不能脱离耳目一样，怎能说丧失了本性呢？）

韩 非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公元前二三三年) 战国末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出身韩国贵族,是荀子的学生。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孔子的理论是“亡国之言”

叶公子高^①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②”……或曰:仲尼之对^③,亡国之言也。叶民有倍^④心,而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

《韩非子·难三》

①叶公子高:叶公,姓沈,名诸梁,字子高,楚国大臣。因封于叶,故叫叶公。

②政在悦近而来远:悦,高兴。意为当政的人,既能使接近他的人高兴,又能使疏远的人来依附。

③对:回答。

④倍:背离。

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①,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韩非子·显学》

①巫祝:巫,自称能以舞降神的人;祝,祝福祷告的人。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①,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②,聚弗靡^③之财,蓄积待时而俾^④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⑤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韩非子·五蠹》

①盛容服而饰辩说:意为用乔装打扮来粉饰花言巧语。

②苦窳之器:粗劣的器物。

③弗靡:奢侈。

④俾:谋取。

⑤蠹:蛀虫。

批判儒家的法先王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①之世者，必为鲧②、禹笑矣。有决渎③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④，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⑤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子·五蠹》

①夏后氏：指夏朝。

②鲧：禹的父亲。

③决渎：疏通江河沟渠。

④株：锯断的树木。

⑤释其耒：释，放下；耒，农具。

事异则备变①。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韩非子·五蠹》

①事异则备变：客观情况不同，所实施的法治也跟着改变。

批判儒家的“仁义”

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①，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

《韩非子·说疑》

①誉广而名威：声誉广传，威望提高。

夫婴儿相与戏也，以尘为饭，以涂①为羹，以木为馐②，然至日晚必归饔③者，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夫称上古之传颂，辩而不惑④，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①涂：泥。

②馐：大肉。

③饔：同饔，吃饭。

④辩而不惑：说得虽好听，但是不真实。

批判孔子“不耕耨”而为“无用之辩”

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①，索②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③如孔、墨④，

孔、墨不耕耨^⑤，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⑥，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

《韩非子·八说》

①远功之行：远离实际的行为。

②索：探求。

③博习辩智：会吹牛皮，表示自己有本事。

④孔、墨：孔子、墨子。

⑤耕耨：耕田除草，意即劳动。

⑥曾、史：曾，曾参，孔子的学生；史，史籀，春秋时卫国的大夫。

批评孔子“不知善赏”

襄子^①围于晋阳^②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寡人国家危，社稷殆^③矣。吾群臣无有不骄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夫善赏罚者，百官不敢侵职，群臣不敢失礼。上设其法，而下无奸诈之心，如此，则可谓善赏罚矣。……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赏。

《韩非子·难一》

①襄子：即赵襄子，晋国大臣。

②晋阳：晋地，在今山西太原。

③社稷殆：社稷，国家；殆，危险。

二、早期法家

管仲

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即管敬仲。春秋初期政治家。他在做齐国的卿时，曾进行改革。有《管子》一书。

批判世卿世禄制度

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释^①也，谓之逆。

《管子·重令》

①相释：释，骄。意为互相不服气。

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不务尽力。治行为上，爵列为下，则豪桀材臣，不务竭能。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

《管子·八观》

反对“礼治”

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

《管子·重令》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①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

《管子·任法》

①任数：数，术数。意为信从治事的方法。

子 产

子产(?——公元前五二二年) 春秋时郑国人。公元前五四三年在郑国执政，曾把“刑书”(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实行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

批判儒家的反动天道观

天道远，人道迩^①，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②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见《左传·昭公十八年》

①迩：近。

②竈：人名，即裨竈，郑国术士。

吴 起

吴起(?——公元前三八一年) 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军事家，卫国人，曾任楚国令尹，实行变法。

批判儒家鼓吹的分封制

大臣太重，封君大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见《韩非子·和氏》

慎 到

慎到(约公元前三九五——公元前三一五年) 战国时期的法家,赵国人。
有《慎子》一书。

批判孔子“有法而行私”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

《慎子·内篇》

官不私亲,法不遗爱①,上下无事,惟法所在②。

《群书治要》卷三十七

①法不遗爱:意为法律不避亲贵大臣,刑上大夫。

②上下无事;惟法所在:意为执政者的任务就在于执行法令。

申 不 害

申不害(约公元前三八五——公元前三三七年) 战国时郑国人,早期法家。
有《申子》一书。

反对“礼治”,主张“法治”

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尧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而安不安,乐其法也。

《艺文类聚》卷五十四

三、墨 家

墨 子

墨子(约公元前四六八——公元前三七六年) 名翟,春秋末期鲁国人,墨家的创始者,从事过手工业。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①，以鬼为不神②，天鬼不说③，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④，重为棺槨，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⑤，耳无闻，目不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⑥。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公孟》

①以天为不明：意为天命是神秘的。

②以鬼为不神：意为魂灵不能成神。

③说：同悦。

④厚葬久丧：指孔子主张对死者要用厚礼埋葬，并实行长期的守丧之制。

⑤扶后起，杖后行：指丧主必须哭泣不吃饭，弄得象病人一样，要别人扶持和拿拐杖才能走路。

⑥有极矣，不可损益也：有极，有一定的常规；损益，增减。

孔丘穷于蔡、陈①之间，藜羹不糗②十日。子路为享豚③，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④，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⑤，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⑥。”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羸饱，则伪行以自饰⑦。污邪诈伪⑧，孰大于此。

《墨子·非儒下》

①蔡、陈：春秋时国名。蔡，今河南上蔡；陈，今河南淮阳。

②藜羹不糗：藜，菜名。糗，以米和羹的意思。这里指用野菜煮汤时，连一点碎米也没有，形容食物粗劣。

③享豚：享，同烹。烹豚，指用火烧的猪肉。

④褫人衣以酤酒：褫，剥夺；酤，买。意为夺了人家衣服去买酒。

⑤割不正弗食：切割的熟肉不够方正就不吃。

⑥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意为从前我和你是为了活命，现在我和你是为了争取政治地位。

⑦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羸饱，则伪行以自饰：意为饥饿时就不惜用鄙劣手段谋求生命；饱暖时，就伪装一副官架子来骗人。

⑧污邪诈伪：污邪，卑鄙无耻；诈伪，虚伪欺骗。

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①。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②，阳货乱乎齐③，佛肸以中牟叛④，漆雕⑤刑残，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⑥。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墨子·非儒下》

①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意为孔丘的行为就是他的心术所达到的表现。

②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子贡、季路（即子路），孔子的学生。意为子贡、季路帮助孔悝在卫国搞政变。

- ③阳货乱乎齐：阳货，又名阳虎，鲁国季氏家臣。意为阳货在齐国叛乱。
 ④佛肸以中牟叛：中牟，古邑名。佛肸是中牟宰，叛离晋国，曾想招孔子去。
 ⑤漆雕：即漆雕开，孔子的学生。
 ⑥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指孔子的学生学习孔子直到力尽智穷为止。

“命者，暴王所作”

命者，暴王所作①，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

《墨子·非命下》

①命者，暴王所作：意为天命论是那些暴虐的国王捏造出来的。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①、贫富、安危、治乱，固有一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②也。

《墨子·非儒下》

①寿夭：寿，指年高命长的人；夭，指少年死亡的人。

②贼天下之人者：意为危害天下人的人。

“儒者”“所循皆小人道也”

儒者曰：“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①”。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②。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③。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④

《墨子·非儒下》

①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意为君子必须穿古人的衣服，说古人说的话，才算是儒家所称的仁人。

②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意为古人说的话、穿的衣服，从当时来说都是新的。

③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意为那末古人说的穿的都是新的，这样就不算君子了。

④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意为那末一定要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说的话，才算是仁人了。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①”应之曰：“古者羿②作弓，仔③作甲，奚仲④作车，巧垂⑤作舟，然则今之鲍函⑥、车匠⑦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⑧，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⑨。”

《墨子·非儒下》

①君子循而不作：意为君子只能遵循古法，不能自己创造什么。

②羿：即后羿，传说他善于射箭。

③仔：即夏代少康之子季仔。

④奚仲：夏禹时的工匠名。

⑤巧垂：尧时的工匠名。

⑥鲍函：制革工匠。

⑦车匠：造车工匠。

⑧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意为现在所遵循的，在古代都是人家新创造出来的。

⑨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意为既然新创造的是小人，那末现在所遵循的都是小人之道了。

晏 婴

晏婴(?——公元前五〇〇年) 春秋时齐国人，字平仲。《晏子春秋》一书系出于后人依托，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晏婴的思想和言行。

“孔丘盛声乐以侈世”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①，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②，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③，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④，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⑤。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⑥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⑦。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⑧，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⑨、趋翔之节⑩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殫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贍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⑪，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

《晏子春秋·外篇第八》

①尔稽：齐国属邑。

②浩裾自顺：浩裾，傲慢。自顺，自以为是。

③好乐缓于民：嗜好音乐，使民俗淫佚。

④道哀费日：意为丧礼的礼节繁琐，旷费时日，影响生产。

⑤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不能用以引导和驯教百姓。

⑥周室之卑：周朝王室的没落。

⑦世德滋衰：指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衰落。

⑧侈世：败坏民俗。

⑨繁登降之礼：指孔子标榜礼治，使各种升堂降阶的仪式繁杂化。

⑩趋翔之节：指行礼时的步伐和舞蹈等动作都要符合乐曲的节奏。

⑪繁饰邪术以营世君：指孔子巧饰邪说，乔装打扮，以讨求国君的宠信。

“今吾望儒而疑之”

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见君不见其从政者，可乎？”仲尼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晏子闻之，曰：“婴则齐之世民①也，不维其行，不识其过，不能自立也②。婴闻之，有幸见爱，不幸见恶，诽谤为类，声响相应③，见行而从之者也。婴闻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顺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顺焉。今未见婴之行，而非其顺

也。婴闻之，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④。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贵之，今吾望儒而疑之。”

《晏子春秋·外篇第八》

①世民：世代为齐国大夫的世族。

②不维其行，不识其过，不能自立也：不能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认识自己的过错，是不能保持自己的名位的。

③有幸见爱，不幸见恶，诽谤为类，声响相应：意为喜欢你的就爱护你，不喜欢你的就厌恶你；诽谤和赞扬各有所好，就好象声音回响一样。

④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意为好比湖泽中的渔民不知斧斤的用处，山林的樵夫不知渔网的用处。

四、道 家

老 子

老子(生死年不详) 姓李名耳，号聃，战国时楚国人，道家创始人，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有《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

“大道废，有仁义”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第十八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第十九章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①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老子》第三十八章

①华：浮夸。

庄 子

庄子(约公元前三六九——公元前二八六年) 名周，战国中期人，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和老子同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并称“老

庄”。著作有《庄子》一书。

“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道不可致^①，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②

《庄子·知北游》

①道不可致：意指道不可得。

②失道而后德……而乱之首也：语见《老子》第三十八章。

多方乎仁义^①而用之者，列于五藏^②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骈于足^③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④者，树无用之指也；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⑤者，淫僻于仁义之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⑥也。

《庄子·骈拇》

①多方乎仁义：用种种方法讲说仁义。

②五藏：心、肝、脾、肺、肾。

③骈于足：脚上的大拇指与第二指相连。

④枝于手：手上的大拇指旁枝生一指。

⑤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意为在本来性情之外，又枝生出种种仁义之道。

⑥多方于聪明之用：意为伪装仁义，自作聪明。

孔子“饰知以惊愚”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①往吊^②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③，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庄子·山木》

①大公任：大公，大夫；任，人名。

②吊：看望。

③饰知以惊愚：意为装得很有学问来吓唬群众。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颜色甚惫^①，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籍^②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庄子·让王》

①惫：疲倦不堪。

②籍：没收财物。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胠传^①曰：“东方作矣^②，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③，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④’。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⑤，摩其颊^⑥，儒以金椎控其颐^⑦，徐别其颊^⑧，无伤口中珠。

《庄子·外物》

①胠传：询问。

②东方作矣：东方天色发亮了。

③裾襦：上下身的衣服。

④青青之麦，生于陵陂：两句为古代逸诗。

⑤接其鬓：揪他的头发。

⑥摩其颊：抓他的胡须。

⑦以金椎控其颐：用铁椎撬开他的嘴巴。

⑧徐别其颊：慢慢地扒开他的两颊。

杨 朱

杨朱(约公元前三九五——公元前三三五年) 战国初期思想家,又称杨子、阳生、阳子居。他的著作没有保存下来,但在《韩非子》、《庄子》、《孟子》等书中保存了一些材料。《列子·杨朱》是后人伪托的。

孔子是“天民之遑遽者”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①，伐树于宋^②，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③，受屈于季氏^④，见辱于阳虎^⑤，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⑥无以异矣。

《列子·杨朱》

①应时君之聘：指孔子到卫、宋、陈、蔡各国去应聘。

②伐树于宋：指孔子到宋国在大树下与弟子演习奴隶制的礼节仪式，宋司马桓魋把大树砍倒，要杀死孔子，孔子仓皇逃走。

③围于陈、蔡：指孔子从蔡国到楚国去，陈、蔡两国军队把孔子包围，并断绝他的粮食。

④受屈于季氏：指孔子为鲁国司寇摄相事，季桓子看不起他，不给他祭祀用的腊肉。

⑤见辱于阳虎：指孔子年轻时到季孙氏家里参与宴会，阳虎把孔子撵走。

⑥株块：朽木、土块。比喻没有用处的东西。

斗争没有结束

常 峰

电影《火红的年代》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那个百般压制赵四海的厂长白显舟，看到“争气钢”已经炼成，我国自己制造的舰艇即将出海试航，“无限感叹”地说：“现在总算什么都解决了。”然而王书记却回答说：“并不是什么都解决了，更艰巨的战斗还在后头呢！”与此同时，那个断言用国产原料炼舰艇钢“此路不通”的总工程师，建议赵四海“写篇论文，拿出去发表，一定能轰动！”赵四海笑笑：“更快地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是一篇大文章，要写，就写这篇大文章吧！”回答得多么好啊！

这段对话，反映着对刚刚结束的一场战斗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在白显舟等看来，钢炼出来了，舰艇造出来了，一切的一切都解决了；赵四海和王书记却不这样看。他们认识到，一场具体的战斗是结束了，但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一篇大文章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就以影片所展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说吧，究竟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还是依赖外国，跟在西方资产阶级后面爬行，当懦夫懒汉和败家子？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是拜倒在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脚下？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扶植工人群众所创造的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来压制以至扼杀**新生事物**？这场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有没有随着“争气钢”的试炼成功而宣告结束呢？没有。戏是结束了，斗争还在继续。

白显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他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代表着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软弱性，总是要迷信西方资产阶级，对着洋菩萨叩头作揖，顶礼膜拜，又总要千方百计兜售拍卖他那套洋奴哲学。所以中国的修正主义者，总带着一股洋奴气。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头子，一个个都是卖国主义者。对于毛主席指出的一个伟大真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是不相信的。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说自力更生，就是要把基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这个力量，最根本的，就是工人阶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象白显舟这类人，就是看不到，也不相信工人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对以赵四海为代表的工人群众的高度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和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一概熟视无睹，好比瞎子。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失败的记

录”，“烧穿了的炉底”。他们不懂得失败之中，包含着成功的因素，二者是可以转化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记录，也恰恰记录着工人们一步步前进的足迹。他们自己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当然也就看不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武装了工人群众能够产生多么伟大的威力。“工人毕竟是工人，他们缺少理论”，又不懂得“尊重科学”，这是白显舟的逻辑。孔老二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刘少奇污蔑工人是“破椅子”，依靠不得，林彪也胡说什么“普通工人的脑筋”“想的是怎样搞钱”等等。白显舟的逻辑盖源出于此。这是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的反动逻辑。你要是去问他真正的理论和科学从哪里来？这等于向瞎子问路。在白显舟看来，“理论”、“科学”，应该是由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垄断的，工人是沾不得一点边儿的。赵四海他们不但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工业的道路，从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来，还要成为科学的真正的主人，这个道理对白显舟来说实在太陌生了，所以理解不了。

在一九六二年这一反帝反修的火红的年代，产生象白显舟这类人物，是不奇怪的。有赵四海，就会有白显舟，对立统一嘛！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十几个年头过去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经过了几次大搏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赵四海的革命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千千万万新的赵四海式的英雄人物也正在斗争中涌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切莫忘记，又会有新的白显舟以新的形式来和今日的赵四海们进行较量。如果以为经过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资派就会断了种，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今天不是又有人在大刮其“进口风”了吗？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什么都想进口，胃口越来越大，在“洋”人面前，他们挥金如土，甚至以拄着洋拐棍走路为荣。一谈起外国“进口”的东西，他们眉飞色舞，即使是过了时的破烂货，也当作宝贝，一副十足的败家子的奴才相；可一谈起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他们就不屑一顾，或者拖长了声调说那么一句：“新生事物嘛！”那神气，令人一望而知他们是把新生事物和“此路不通”联系在一起的。你要是批评他是洋奴哲学，他便会还你一顶帽子：“闭关自守”。似乎我们反对的，不是他们的“崇洋迷外”的思想和路线，而是反对必要的进口。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水搅混了，把人吓唬住，他们的错误路线就可以因此而通行无阻了。对于这种人，确实需要向他们大喝一声：此路不通！

当然，立场是可以转变的，路线错误也是可以改正的。电影里的白显舟，被资产阶级拉了过去，后来不是又变过来了吗？但是，这种转变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工人阶级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赵四海对白显舟的态度，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工人阶级就是这样宏大的气魄。他们不但能够炼出争气钢，而且能够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团结和改造一切可以团结和改造的人们。尽管有人污蔑他们是“出风头，赶浪头”，可是他们象赵四海一样，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个人的得失。“赶浪头”嘛，革命的浪头就是要赶，岂止是赶，硬是要倒海翻江，卷起革命的巨澜，谁要是带着花岗石脑袋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毫不留情地淹没他！他们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满怀革命的豪情，用他们粗大的双手，把赵四海写的“大文章”继续写下去，把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志气统统写进去。“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青年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

——谈谈电影文学剧本《陈玉成》

上棉十七厂青年工人 郑树清

上无四厂青年工人 莫建备

“一身都是胆，是个好将领”。这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赞扬青年英雄陈玉成的一句话。读完电影文学剧本《陈玉成》，这个十四岁参加童子兵，二十一岁成为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的青年革命英雄就顶天立地矗立在我们面前了。《陈》剧以绚丽多采的文字，描绘了陈玉成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深入地刻划了这个来自人民、刚毅而又朴实的农民革命将领的优秀品质，热情地歌颂了他的丰功伟绩。歌颂陈玉成就是歌颂新生力量，就是歌颂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谈谈这个剧本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去看待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是很有启发的。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陈》剧自始至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光辉真理。《陈》剧的序曲是这样开始的，奔腾的长江浪花飞溅，阴霾的江天硝烟弥漫，给人一派战火纷飞的景象；紧接着，向读者介绍了故事发生在太平天国第八个年头。这个年头正是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候。一方面，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韦昌辉杀害了二万多名太平军的优秀将领和战士，叛徒石达开搞分裂带走了二十多万部队。这些叛乱和分裂，虽然都被洪秀全粉碎了，但是它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军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清朝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全力向太平天国猛扑过来。显然，这个年头是太平天国极其困难的年头，阶级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的地步。粉碎反革命的围剿，不能不是一场极其艰苦的伟大斗争。《陈》剧在描写九江保卫战激烈搏斗的一个场面后，在滚滚浓烟中推出片名《陈玉成》，向读者显示这个青年英雄人物，是在阶级大搏斗中锻造出来的。《陈》剧第八节，通过回忆提到了陈玉成十三、四岁举斧砍死村里欺压百姓的恶霸地主，投奔革命队伍的历史。正是太平天国这场伟大的农民起义，把这个少年卷进了革命队伍。他在革命的征途中迅速地成长，从童子兵一直成为太平军的军事统帅。你看不起童子兵吗？《陈》剧用艺术形式证明：千千万万出色的群众领袖都是从童子兵过来的。《陈》剧塑造的十五岁的黄毛丫头春妞，用竹竿机智地打死了曾国藩弟弟曾国华，“斩了一个妖头”，这决不是无中生有的夸张，联系到陈玉成十四岁就斧劈狗地主，可以说春妞也就是陈玉成童年的写照。其实，在太平天国这场震撼全国的革命运动中，象陈玉成、春妞这样的少年英雄何止

千千万万。历史上每次大革命运动，都有一大批青少年为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太平天国有“童子兵”，义和团运动中有“红灯照”，抗日战争中有“儿童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红卫兵”，他们都在每次大革命的历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有人认为，写历史人物总要从他的出身写到他的死去。《陈》剧却没有这样写，而是截取了陈玉成一生最光荣的几个片断，特别是集中写了陈玉成指挥的著名的三河大捷前后这一段。三河大捷，集中反映了陈玉成的丰功伟绩，是陈玉成革命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这一仗歼灭了号称“威望冠诸军”的湘军李续宾部队六千多人，其中文武官员就有四百多人。历史上，反动头子曾国藩曾经说过，“自从三河败后，元气大伤”，“大局顿时变坏了”；另一个清军头目胡林翼悲叹，三河大捷使“四年纠合起来的精锐力量，覆于一旦”。正是这一仗使太平天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使太平天国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相对的稳定。全剧通过这一战役来着力刻划陈玉成的英雄品格，他的英勇无畏、远见卓识和军事才能，英雄人物的“英雄”之点就被抓住了。

全剧通过三次不打九江，说明了陈玉成是个优秀的指挥员。第一次，陈去九江救林启容，赶到时林已牺牲。这时，太平军另一个将领吴定规主张立即冲入九江，可是陈玉成却命令部队立即返回安庆。远道而来，失去内应，贸然冲入九江，就会使整个部队陷入重围。陈玉成第一次不打九江，使部队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第二次，李续宾阴谋引太平军打九江，他就可以趁安徽空虚，乘虚而入。陈玉成再次纠正吴定规打九江的主张，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军事原则，悄悄地一举扫平了安徽庐州，控制了三河镇这个水陆要冲。攻占了庐州三河后，是先打江北大营，还是打九江，陈玉成又第三次克服了吴定规的错误主张，决定先打江北大营。对此，陈玉成作了形象的比喻：把一只圆的西瓜比作李续宾，“湘军打仗很活动，打不过就会溜”，圆的西瓜一打就滚；而长瓜——江北大营，“连营几十里，各营互相牵制，行动呆笨……挨了打也动不了”，砸开长瓜。三次不打九江，必然使李续宾兵骄将傲，这样就可以引蛇出洞，一举而歼灭之。结果，不出陈玉成的意料。吴定规三次要打九江，报林启容被杀之仇，而陈玉成懂得：“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这是一个多么成熟老练的青年将领！当然陈玉成三次不打九江，也是由于正确路线的指导。洪秀全曾嘱咐过他，在关键时刻要“权衡利害，顾全大局”。陈玉成记住了这句话，并付之实践，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胸怀全局，明察秋毫，坚定、沉着、机智、果断地去夺取胜利。洪秀全把“振兴天国的重任”托付给陈玉成，陈玉成没有辜负这种信任，他所率领的队伍，攻无不克，所向披靡，这对那种认为青年人“嫩竹扁担挑不起重担”的说法，倒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历史上有很多革命英雄，都是青年人，事实证明他们完全能挑起革命重担。

实践出才干。陈玉成英勇善战，并不是爹妈给他的脑袋特别灵。陈玉成说：“金田起义前，连自己的‘陈’字都写不来。”不懂得带兵打仗怎么办？陈玉成与汪春海的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陈玉成用力击他一掌：“好！春海，你长进很快！”他从筒里拈出一杆令旗：“你地形熟，烟墩岗伏兵就由你指挥！”

汪春海懵了：“我？”

陈玉成：“对！”

汪春海急了：“我，我那行啊？我又没带过兵！”

陈玉成：“没带过，就学着带，边带边学！”

汪春海：“这！……”

陈玉成热情鼓励：“谁生下来就会打仗？本领，是打出来的。……”

汪春海抱紧令旗，激动得说不出话。

本领是打出来的，这是陈玉成自己的斗争经验的总结。他就是在洪秀全的指导下，认真读书，勇于实践，从没有打过仗到能打仗，而且能打大胜仗；从没有带过兵到能指挥百万大军。他深信没有带过兵的汪春海，只要“肚里有苦水，心里有天国”，和自己一样什么都能学会，这是对“天才史观”的有力驳斥。

新生力量是革命的未来和希望，历史上的每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总要涌现出许许多多年青的领袖人物。历史的发展，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对陈玉成这样的年青统帅，天王信任他，战士爱戴他，只有李续宾看他不起，认为“这种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真正是何足道哉！”结果他自己恰恰就死在这个“黄毛小儿”的“斩妖剑”之下。这是对那些藐视革命的“黄毛小儿”的反动势力的深刻的讽刺。

（上接 32 页）

马列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骗子手加洋大人的宠犬的真实嘴脸，就很清楚地显露了出来。

鲁迅一生用过多种比较法，把反面人物的言与行相对照，仅是其中之一。他还善于把要批判的反面人物与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相比较，把反面人物与正面人物相比较。通过比较，看出了阶级敌人“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对于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又说：一个革命者“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鲁迅正是由于刻苦攻读马列，通过在实际斗争中进行“比较和对照”，才逐渐成熟起来，终于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今天，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鲁迅的比较法，辨真伪，“防被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奋斗到底！

抓好生产领域内的思想斗争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批判“谁发扬风格谁倒霉”
的错误思潮的调查报告

周 诚 王 华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遵循毛主席关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伟大教导，针对厂内出现的“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错误思潮，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前几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涤荡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在这家工厂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斗争还是长期的。近年来，由于厂的领导放松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又泛滥起来。一九七三年八月之前，工人说厂里是烧不开的“温吞水”，全年计划只完成百分之四十二。九月以后，党委比较认真地抓了思想斗争，全厂精神振奋，热气腾腾，三个多月完成了六个多月的任务，全年计划提前完成，总产值比去年增长了将近百分之五十。

这是过去一年中，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新的进攻在工厂企业里激起的一个小小的浪花。这个厂的工人和干部总结这一年的经验教训时，都深有体会的说：“抓不抓生产领域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大不一样！”

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第二纺织机械厂是个有三千多职工的工厂，过去主要生产细纱机。最近几年，由于化学纤维工业的发展，制造化纤设备的任务相应增加。一九七三年，细纱机要增产，新产品制造任务也比往年多得多，仅国家迫切需要的高温高压染色机就要生产九十台。任务重，带来的问题也多。可是，由于厂的领导不抓思想，不抓路线，厂里流行着一种“谁发扬风格

谁倒霉”的论调。按照这种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抢难挑重,先人后己,是“倒霉”;不讲共产主义风格,拈轻怕重,损人利己,倒是“合算”。这样,就使厂内许多可以办到的事情办不到,许多可以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上半年任务完成得很差,九十台染色机连两台样机都没有过关。有些领导干部认为:“今年计划吃了人参也完不成了”,要求上级削减任务,想“下马”。

正在这时,八月十三日,厂内墙报上发表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第一金工车间大件组两位工人同志写的,题目叫做“致厂党委一封公开信”。大字报从小组刀具供应问题因有关部门相互推诿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件事出发,揭露厂领导不抓思想政治路线的错误,同时对“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论调进行了批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思想是很错误的,它腐蚀人们的灵魂,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使人们不从全局出发,只看到个人的、本位的利益,颠倒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大字报要求厂党委把这件事“作为大事来抓,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带动全厂职工迅速掀起一个学先进、找差距、揭矛盾的群众运动。”

“谁发扬风格谁倒霉”这种论调,在这家厂里所以流行,和厂领导的思想作风有关。这个厂的有些领导干部对于国家交给的任务,不是勇于挑担子;在处理和外厂的协作关系方面,也常常显得风格不高。厂内布置任务时,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就事论事,“欺软怕硬”。乐意挑担子的车间愈压愈重,对拈轻怕重而又顶得厉害的车间却不敢压下去。遇有突击任务,总是找“好说话”的车间,靠“拍拍肩膀”、要干部“帮帮忙”解决问题。到了月底,厂领导不问路线风格,任务轻,舒舒服服地完成计划,照样受表扬;任务重,虽然汗流浹背,完不成任务,还是挨批评。领导上这种不问下面实际情况,不抓思想倾向,不分是非好歹的官僚主义作风,助长了错误思想的滋长。久而久之,“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论调就更加传开了。

“谁发扬风格谁倒霉”这种错误思潮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剂,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直接起着破坏和瓦解的作用。这种思潮的泛滥,给厂内的革命和生产造成很大损害。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受到腐蚀,正气不能抬头,邪气上升。车间与车间、部门与部门、同志与同志之间的团结协作遭到破坏,“踢皮球”、“打太极拳”、“没肩膀”(不负责任)等不正之风也就盛行起来。有的干部对于上面的任务,能顶则顶,能推则推。厂里的调度会,常常变成“扯皮会”。个别干部甚至把“守好球门”作为做工作的“诀窍”,不以为耻。有时仅仅因为锉一锉零件的毛头,两个车间你推我不管,一拖很长时间。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他们批评说:“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前的腔调又要来了。”

在一个工厂企业里,如果让资产阶级思潮得势,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就不能巩固。二纺机前一阶段的状况正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工人阶级是决不容许资产阶级思想任意泛滥的。大件组两位工人同志写的大字报,正是反映了全厂广大职工要求继续革命的坚决意志。不抓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行。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为了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他们拿起了大字报这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

错误思潮也是纸老虎

对于错误思潮和歪风邪气采取什么态度，是批评斗争还是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这是检验党的组织是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抓大事，抓路线，抓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标志。在上级领导同志的帮助下，党委向全厂职工写了公开信，表示接受两位工人同志的批评，号召全厂职工充分揭露矛盾，继续提出批评和意见。党委同时决定：在全厂范围内，广泛开展对“谁发扬风格谁倒霉”这种错误思潮的批判。

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展开了。群众斗志昂扬，欢欣鼓舞。但是，也有人说：“只是几把刀子的事，何必这样小题大做？”有的干部则信心不足，认为这种思想比较“普遍”，怕“批不起来”，“解决不了问题”。

领导决心大，才能带领群众一起前进。为了首先抓好领导和干部的思想，党委先后召开了党委会，举办了干部学习班，统一大家的认识。十大文件发表后，党委又组织大家学习十大文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用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对照检查自己。党委还请写大字报的两位工人老师傅和其他工人同志来学习班“上课”，让他们向全厂车间以上的党政工团干部揭露“扯皮风”的种种表现，大摆不讲共产主义风格的危害，使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厂内思想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对这种思潮开展斗争的必要性，看到这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而是关系到抓不抓路线，抓不抓思想的重大原则问题。他们还联系批判尊孔反法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厂内资产阶级思潮的再度泛滥，也是一种“回潮”的表现。这说明旧思想、旧习惯在革命高潮中受到打击，一遇适当气候，又会卷土重来，必须认真重视，敢于斗争，敢于批判。有些过去受这种错误思潮影响的同志，还根据十大的要求，从党的基本路线，从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等问题上联系自己的思想作了检查。通过学习讨论，干部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把这场思想斗争认真地抓起来。他们相信，这种错误思潮看起来似乎很有市场，但是，“邪不胜正”，只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地抓，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错误思潮是一定会克服下去的。

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战，更要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只有群众起来了，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优势，“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战胜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厂党委把大字报加了按语，印发给全厂所有班组分析讨论。有线广播里，接连几天广播这张大字报。在班组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工人同志又写了几百张大字报、小评论。全厂上上下下，大会小会，到处开展革命大批判，搞臭“扯皮风”。工人群众以十大精神为武器，摆事实，讲道理，立场鲜明，尖锐泼辣，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歪风。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认识，澄清了思想，越批心里越亮堂，越批越分清了路线是非。许多小组还把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批判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他们说：“刘少奇、林彪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竭力鼓吹‘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没利不干’的反动谬论，我们要光为个人打算，没名没利没好处的就不干，说什么‘谁发扬风格谁倒霉’，那不就是中了

刘少奇、林彪一伙散布的流毒，往邪路上滑吗？”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厂党委在大抓干部思想和群众性批判的同时，还抓住厂内出现的大讲共产主义风格的典型事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使批判更加生动有力。这个厂的铸冶组老工人多，本身任务很重。在群众性的分析批判中，他们拿着决心书，开着电瓶车，到党委请战，要求把各车间积压下来的大件运输任务交给他们。他们说：“我们就是要针锋相对。不管什么倒霉不倒霉，合算不合算，搭界不搭界，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们都干。我们就是一心要干革命，干社会主义。”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一个晚上搬掉了平时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搬完的积压下来的部件，并且把以后厂内大件运输任务全部包了下来。看到他们的行动，很多工人说：“他们搬掉的不是几吨东西，搬掉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他们的带动下，广大工人群众纷纷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大讲共产主义风格，大批“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错误论调。无产阶级的正气大大发扬，抢难挑重，先人后己，团结协作的好人好事大量涌现。

错误思潮也是纸老虎。它一时仿佛占了上风，党委一重视，群众一起来，就开始土崩瓦解了。从八月十三日两位工人同志的大字报贴出来，到九月上旬仅仅相隔一个月，厂内形势大变。首先是舆论变了。过去讲：“谁发扬风格谁倒霉”，而今听不到了。现在，“谁发扬风格谁光荣”，“把方便送给别人，用困难促进自己”，“一方有困难，大家来支援”等口号，到处传诵。过去，“扯皮”成风，现在，谁要想“扯皮”，就会遭到群众的批评和抵制。这个厂的第三金工车间个别干部过去风格不高。大件组工人同志的大字报贴出不久，装配车间为了争取提前完成任务，要求第三金工车间协作加工的廿几个重要零件，能在三天内做好。这个车间的一个干部强调困难，想拖延时间。工人群众知道后，立即对他提出批评，说：“你老毛病又来了。我们工作紧一点，兄弟车间就宽舒一点。困难要留给自己，不要把困难向外推。你不接，我们接。”当时有位老师傅已洗好澡准备下班，听说是支援兄弟车间的，马上换上工作服干起来。结果，几位老师傅工作到凌晨三点，就把全部零件做好，送到装配车间。厂内共产主义风格的发扬，也加强了厂外的协作。过去，兄弟单位来买配件，仓库里明明有货，有些干部风格不高，想“留一手”，或者想和对方“讲斤头”，不肯卖。批判了“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错误论调，成品仓库的工人不仅揭发批评了这些事情，而且一看到外厂来买配件，只要仓库里有，都主动满足外单位的需要。

冲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防空洞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旧制度的维护者，而旧的制度又给旧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合法的“依据”。群众起来向错误思潮开火的同时，也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那些和旧意识形态相联系而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旧矩。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厂。最初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办的“内外棉八厂”，以后一度改为军工厂。抗日战争胜利后归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中纺公司管理。解放后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使规章制度逐步适应群众的需要。但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

线的干扰下,推行过“一长制”,试办过“托拉斯”,又搞过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起来冲击了陈规旧矩,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在革命高潮中也纷纷走出办公室,到车间里劳动,同工人结合,受到群众的欢迎。可是,前一两年,在加强企业管理的过程中,有些“老皇历”又被重新翻出来了。下放在车间里的技术人员和检验人员,绝大部分重新集中到厂部,车间对面一排房子坐得满满的,工人称之为“技术一条街”。有些旧制度也重新拿出来实施了。有些制度是冲掉了,但长期在这些制度下形成的旧习惯势力仍然在作怪。

群众在批判“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错误思想同时,强烈要求改变束缚积极性的陈规旧矩。他们列举许多事实,说明厂里的一些陈规不利于团结协作和革新创造,却为不负责任和扯皮的歪风开了方便之门。例如,工人创造的刀具和工艺装备,技术管理部门不予制造是合法的,而帮助加工制造却是不合制度的。工人创造的机床和设备,损坏以后也没有人去修理,因为设备维护保养只负责修理登记簿写明的设备,工人造的土设备却是挂不上号的。年初,厂团委组织青年利用业余时间搞了一套利用余热的装置,可供全厂三千多职工的生活用热水,每天约可节约两吨煤,而损坏之后,设备部门却不给修理,理由是“非正式设备”,按规定不予修理。有些工艺和设计上的改动,层层审批,关卡奇多,手续烦琐,相互推诿,拖延时间,给群众带来很多麻烦。主动挑重担,承担任务比较重的部门,这一类问题遇到最多,往往得不到解决。工人对这种现象很有意见,气愤地说:“这是洋规矩专了土办法的政!”“陈规旧矩是旧思想的防空洞,非破不可!”

厂党委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深深感到:在批判“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错误思想的同时,一定要抓好管理部门的思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为此,干部和管理人员就要深入生产第一线。九月以后,厂党委、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一分为二,一部分下去协助车间支部工作,加强调查研究,一部分主持日常工作,并且经常在业余时间参加劳动。干部和管理人员分别到各个车间,实行“四个到现场”,即:领导到现场,计划到现场,调度到现场,技术设计到现场。

实行“四到现场”,干部、管理人员和工人在一起商量问题,解决问题,开始冲破了一些旧的管理办法,形成了一些新的作风和规矩。据群众反映,它有这样几个明显的好处:

解决问题快了。原来工人遇事上门找管理部门,往往要经过十几道“关口”,六、七个部门的大小负责人点头,拖延了时间,耽误了工作。现在,领导、计划、调度、技术人员都在现场,有问题当场商量决定,简化了程序和手续,减少了“踢皮球”现象,给工人带来了方便。

脱离实际的现象容易得到纠正。计划、技术等部门下现场,打破原来“技术、管理人员坐办公室动口动笔,工人在车间动手照干”的状况,原来不切实际的情况可以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例如,高温高压染色机上有个密封装置,装配后试验发现有漏水、漏气现象,工人几次希望设计人员下去一起研究。可是设计人员坐在办公室里偏说是工人加工达不到要求。这件事扯皮扯了几个月没有解决,实行“四到现场”以后,工人、技术人员组成三结合小组,改进了设计,结果三天里就把问题解决了。

有利于实行管理民主、计划民主、技术民主，逐步建立新的生产秩序。以前，计划工作只由少数人作主，工人对生产进度的轻重缓急不清楚。领导和计划人员下去以后，改变了“计划部门订计划，调度部门抓计划，工人实现计划”的老规矩，把生产任务原原本本向群众交底，让大家一起来掌握生产计划，大家干有目标，追有方向，有劲使得上。有一个车间，以前试造两台产品花了半年时间，九月份却要装出二十八台，开头干部总认为任务太重，很难完成。实行计划民主后，把全月的任务画成一张明细图，挂在车间里，使每个班组都了解生产进度。同时，又把生产上的关键难点也统统交给群众，由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群众知道生产进度和关键难点，积极性很高，提出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宁可自己掉身膘，国家要的机器一台不能少！”全车间齐心协力，苦干加巧干，顺利完成了全月任务。

还要努力作战

毛主席说：“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

这几个月来，第二纺织机械厂的变化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在激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错误论调被克服下去了，保护旧思想的旧制度开始被冲破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革命和生产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染色机的两台样机搞了几个月没过关。思想斗争开展以后，九月份一个月，就拿下了十五台。十月、十一月，再接再厉，又完成了五十五台。原来认为“吃人参也完不成”的全年计划，提前七天完成了。“烧不开的温吞水”烧开了。广大职工扬眉吐气。他们说：“这几个月人虽然辛苦，但干得心情舒畅。”

年底以前，这个厂的党委在取得前一阶段思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又举办了干部学习班，继续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回顾总结去年一年的经验教训，找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深深感到，去年九月前后，厂里的变化虽然很大，但是，这只是一个好的开端，还要努力作战；特别要警惕旧意识、旧习惯的回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生产领域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长期的，不是抓一阵子可以结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它总会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表现出来。“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论调克服下去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会在别的问题上借尸还魂，一不注意，就会从阴暗角落里窜出来，乔装打扮，反攻倒算。因此，必须经常警惕，不断开展生产领域内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这个厂的党委决心紧密结合本单位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林批孔，清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在新的一年里乘胜前进，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论 风 格

树 人

风格,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在阶级社会里,风格,总是表现了阶级的思想,阶级的意志,阶级的作风。毛主席说:“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同样,有多少阶级也就有多少种风格。

从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对于“谁发扬风格谁倒霉”这种错误思潮的分析批判中可以看到,在一个工厂里,也有不同的风格:

有些人,接受任务,拈轻怕重,能顶则顶,能推则推。一事当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他们习惯于“扯皮”、“打太极拳”、“踢皮球”。——这是一种。

有些人,工作多做一点,担子挑重一点,就斤斤计较,觉得自己“力气多用了”、“汗出多了”、“吃亏了”。于是咕咕哝哝,说什么“谁发扬风格谁倒霉”。——这也是一种。

还有些同志,以“龙江”风格为榜样,抢难挑重。“宁可自己掉身膘,国家要的机器一台不能少!”他们不管份内份外,搭界不搭界;不管自己“合算不合算”、“倒霉不倒霉”,只要对国家、对集体、对革命、对社会主义有利,他们都抢着干。——这又是一种。

可见,咕哝“谁发扬风格谁倒霉”的人,也不是不要“发扬风格”,不过,他只是要发扬他自己的风格。

一个厂是如此。扩而大之,在行业当中,在部门与部门、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社会上,都存在着不同的风格。当然,总起来说,也无非是两家:无产阶级的风格和资产阶级的风格。

风格,也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又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不同的风格,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起巩固和促进的作用,也可以起破坏的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需要发扬的不是随便什么风格,而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

共产主义风格,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是一个集中统一的整体。毛主席说:“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当然不可以没有社会分工。但是,不管是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还是在工业内部的各行各业,各个工种,都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巨大机器的一个部件,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个根本特点,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应该树立集体的观念,全局的观念;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的目标下,相互支持,相互协作。

共产主义风格，正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个根本要求。只有使“毫不利己破私念，专门利人公在先”、“革命不分甲、乙、丙”、“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把方便让给别人，用困难促进自己”等等共产主义的风格大大发扬起来了，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改善厂与厂、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最广泛、最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推动生产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极大优越性的具体表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工业战线的许多先进单位、先进集体，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上海近年来出现的诸如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彩色印报机等等重大的新产品、新技术，为什么能够很快搞成？查一查原因，也往往会发现一条经验：因为参与其事的单位，发扬了共产主义的风格，改善了相互关系，开展了厂内厂外的大协作。这一条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要求，符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的原理，因而是行之有效的，应该认真吸取。

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必须通过斗争。必须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多少年来，孔孟和一切剥削阶级宣扬的极端利己主义，在工厂企业里还留有不少的影响。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不顾国家，不顾整体，一切以“我”为转移，就是它的特点。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歪风邪气，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根本对立的。哪里出现这种歪风，哪里共产主义风格就发扬不起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不仅生产会遭受严重损害，甚至会使企业变质，走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发扬什么风格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调和的余地。要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必须克服和扫除各种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一九七三年九月前后的变化，是个令人深思的例子。九月以前，这个厂在资产阶级思潮影响下，资产阶级歪风盛行，正气不能抬头，工人心情不舒畅，生产搞不好。九月以后，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潮，打击了歪风，共产主义风格发扬起来了，工人群众扬眉吐气，革命和生产马上出现了新的气象。两种思想，两种风格，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由此可见，风格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个路线问题。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发扬什么风格，反对什么风格，让什么风格占上风，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因素，也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因素，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它们之间的斗争和消长，决定着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是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还是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在一个企业内，如果不大力支持和提倡共产主义风格，而听任资产阶级歪风泛滥，不闻不问，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会有丧失的危险。因此，必须把发扬什么风格的问题，作为路线的一个部分来抓，不断开展经济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使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使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使无产阶级江山不断巩固。

全面关心插队知识青年的成长

孙 澄

我在参加赴云南学习慰问团工作的三年中，深深地感到，城市派干部配合当地党组织做好插队知识青年的工作，十分必要。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茁壮成长，很需要我们从各方面去关心、帮助。

要关心插队知识青年，就要帮助他们确立扎根农村的思想。我们在农村学习、慰问，看到广大知识青年在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关怀下，战天斗地，进步很快。但是，也有少数青年，由于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毒害，或者由于生活安排不好，影响他们在农村安心干一辈子。我们曾经看到一个由九个上海知识青年组成的集体插队户，因为缺少生活锻炼，烧苞米粉饭，上面生、下面焦、中间烂；到井旁打水，不会用吊桶，也不会挑担，三个人半天打不满一桶水；吃菜、烧柴都要靠贫下中农供给。我们来自城市的干部，乍到农村，也同样不适应农村生活。因此，看到这些青年的困难，最有感受，更感到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我们同知识青年一起向贫下中农学习烧饭，一起学习打水、砍柴、种菜。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亲眼看到这个集体户的九名知识青年吃着香喷喷的苞米饭和亲手种出来的蔬菜，同贫下中农一起流汗战斗，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

也有一些青年，往往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矛盾，就影响情绪，不安心起来了。当我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想到自己在三十年前刚参加革命工作时，也闹过情绪，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在党的培养、老同志的帮助下取得的。现在，青年人在革命征途中遇到了矛盾，我们作为老一辈的，怎能不去关心呢？有个青年对分配的工作不满意，积极性不高，我就同他一起劳动，请老贫农向他进行阶级教育。他觉悟提高后，学习和劳动都很积极。我们还组织知识青年学习理发、医疗、木工、电工等技术，白天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晚上为贫下中农理发、治病、修理门窗。不少青年被贫下中农称赞为：“我们的好娃娃。”这样，知识青年同贫下中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更加热爱云南边疆的一草一木了。

要关心插队知识青年，还要帮助他们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雄心壮志。我们在学习和慰问过程中,也发现有少数青年,原来以为云南边疆就象电影《美丽的西双版纳》那样好玩,是“头顶香蕉,脚踏菠萝”,到处都长满花果。但是,到了山村,原来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是夏种秋收,以为在这里干一辈子没出息。针对这个思想,我们向他们宣传先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业迹,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无限美好的前景。使他们懂得:头上的香蕉、脚旁的菠萝是靠辛勤劳动种出来的,西双版纳的美丽风光全靠劳动人民双手去描绘。后来,我们又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知识青年上乌蒙山,走当年红军长征时走过的路,使知识青年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许多青年坚决表示要走革命先烈的革命道路,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会泽县新云大队十个知识青年,阶级斗争冲在先,工作重担争着挑,几年来,吃菜做到自给,是全县插队知识青年艰苦创业的榜样。有一次,生产队要到八十里外的山坡下挑红薯秧,山上山下气温相差一、二十度,生产队干部不让他们去,他们却表示:“要走红军艰苦奋斗的道路,定叫荒山变果园。”坚持下山,来回一百六十里,完成了挑秧任务。后来,我们在学习慰问的过程中,到处宣传这个先进典型,对广大知识青年鼓舞很大,广泛地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有些原来比较落后的插队青年集体户和知识青年,逐步改变了面貌,赶上了先进。新云大队一位原来比较落后的青年,后来居上,一九七二年还被推选出席云南省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要关心插队知识青年,还要帮助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妄图破坏这个革命,并不奇怪。我们在学习、慰问中,就曾发现一个混入某商业公司的阶级敌人,以关心知识青年为名,向知识青年灌输封、资、修的毒素,唆使个别意志薄弱的青年弃农从商,搞投机贩卖。这是资产阶级同我们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严重斗争。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后,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而且把这件事当作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的内容,组织知识青年对这个阶级敌人进行揭发和斗争,狠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使广大知识青年得到一次很好的阶级斗争的锻炼。

我在云南三年,亲眼看到上海知识青年在党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茁壮成长,不少青年入了团,有的入了党,成了边疆三大革命斗争的骨干。这个事实,就是对孔子“学而优则仕”和林彪攻击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有力批判。广大知识青年在山区农村做出的动人事迹,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更加深刻地理解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同时,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慰问活动,我走过了云南许多农村,使我也同插队的上海知识青年一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山山水水。今天,我虽然由于工作需要,已经调回上海工作,但是,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出更多的贡献,我向组织上提出,让我有再一次的机会,参加赴外省学习慰问团的工作。

《哲学小辞典》词目选登

【编者按】 本刊于本期选登了《哲学小辞典》中有关儒法论争的词目十条，今后还将陆续选登其他有关词目，目的是为了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这一辞典的编纂工作，采取了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式，直接参加编写工作的有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商店、机关等三十个单位。

儒家 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学派，主要代表是孔子和孟子。

儒，本来是指替奴隶主贵族办丧事之类的人。孔子开始也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后来办学校，宣扬复古倒退思想，从事反对社会变革的复辟活动，逐渐形成一个学派，称为儒家。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反动学说。秦汉以后，继承并发挥孔孟之道的，也统称儒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儒家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一边。他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要求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叫做“法先王”；提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妄图复辟周朝奴隶社会的“礼治”。

儒家宣扬天命论，胡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奴隶主阶级的政权说成是由“天”授予的，要奴隶们“畏天命”，服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儒家鼓吹先验论，提出“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良知良能”等谬论，说奴隶主贵族是天生聪明的“劳心者”，奴

隶是天生愚蠢的“劳力者”，强调奴隶主的统治是天然合理的。

儒家还宣扬“仁义”、“忠恕”、“中庸”一类虚伪的道德，要奴隶主贵族互相爱护，一致对付奴隶们的“犯上作乱”，维护奴隶制。并以这些虚伪的道德信条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

最早批判儒家思想的是战国初期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以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兴起，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和韩非，对儒家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更进而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儒家的复辟活动。

汉朝地主阶级巩固政权以后，认为儒家维护旧制度的思想体系和虚伪狡猾的骗术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一转而尊儒反法。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各个时期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继承和发展了反动的孔孟之道。在两汉，有董仲

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在唐代，有韩愈的“道统”说，编造了一套儒家思想继承系统的理论。宋明以后，在儒家思想中吸收了一部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出现了以程朱（程颢、程颐和朱熹）和陆王（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分别从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方面发挥了儒家的学说。

有反动必有进步。在封建社会，起义的农民以革命的行动和口号对儒家理论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近代，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从理论到实践对儒家进行了猛烈的摧毁。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剧烈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批判了儒家思想，摧毁了儒家思想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一切没落阶级的代表，从袁世凯、蒋介石到刘少奇、林彪，为了复辟地主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无不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武器。因此，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仍然是上层建筑领域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而长期的任务。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名丘，又叫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生活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一生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奔走卖命。他妄图开历史的倒车，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要求一切都按西周奴隶主贵族的旧制度办事。他极端仇视新兴的地主阶级，在鲁国执政的时候，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少正卯。这充分暴露了他是一

个坚持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穷凶极恶的顽固派，具有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很浓。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的要害是“克己复礼”。这是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克己”是约束自己；“复礼”是恢复殷周奴隶社会的“礼治”。他认为只要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顺从你的统治了。因此，他强调要“约之于礼”，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都要符合“礼”的规定。他还提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说“孝”与“悌”是仁的根本，要求在奴隶主贵族内部尊长扶幼，相亲相爱，加强团结，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可见“孝悌为本”和“克己复礼”完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吹守旧和倒退。

孔子宣扬天命论。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合乎天意的。他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提倡“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要奴隶俯首贴耳服从奴隶主的残酷统治。

孔子宣扬“生而知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自称“天生德于予”，吹嘘自己是天生的有德的圣人。他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把奴隶主贵族说成是天生有智慧的上等人，劳动人民是天生愚笨的下等人。

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极其反动的。他主张“学而优则仕”，鼓吹读书做官论，并且极端鄙视生产劳动，还提出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地主阶级由进步趋向反动，孔子被抬到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吓人的高度，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反动头子就都是尊孔派。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如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也

都是尊孔派。

孟子（约公元前372—289年）

名轲，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当时，封建制在各诸侯国已经或正在建立，孟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激烈地反对主张变革的法家，自称是孔子的继承人。他为了反对当时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毕生周游各国，宣扬复辟奴隶制度，由于违反历史潮流，到处碰壁。他的反动学说，收集在《孟子》一书中。

孟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鼓吹“法先王”即效法前代的帝王，要开历史的倒车。他主张“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法”。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对人施行仁爱（这个“人”不包括奴隶在内，在孟子眼里奴隶不当作人），美其名曰“仁政”。这是对孔子反动思想核心“仁”的继承和发挥，是用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的。他主张“仁政必自经界始”，即恢复已被废除的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井田制”。这说明孟子鼓吹的仁政，实质上是“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奴隶主暴政。孟子又讲“民为贵”，这并不是替劳动人民争地位，而是要恢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至于他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更是赤裸裸地主张奴隶主贵族应该统治奴隶，奴隶应该服从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奴隶应该供养奴隶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应该接受奴隶的供养。他还鼓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谬论，宣扬反动的英雄史观。

孟子继承孔子的“天命”思想，说奴隶主阶级的政权是“天与之”，不可变革。天虽然不讲话，但天的意志“以行与事示之”，

通过人的德行与政事显示出来。他根据子思“天命之谓性”的观点，鼓吹性善论。他说人性生来是“善”的，“仁”、“义”、“礼”、“智”这些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是人的天性中所固有的，天生就有的。

孟子和孔子一样，根本不承认认识是客观的反映。他提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的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路线。他说人有“不虑而知”的“良知”，有“不学而能”的“良能”，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具有的。“万物皆备于我”，用不着向客观外界寻求。只要发挥自己的本心（“尽心”），扩充自己的善性（“知性”），就可以通天（“知天”），达到天人合一的无差别境界。为了贯彻这条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路线，他又提出一套内心“反省”的方法，要人们“不动心”，排除外界的影响；“养浩然之气”，保养人性中固有的道义之气。长期来这套神秘主义的修养经流毒很深。

孟子的思想和孔子一脉相承，后来经过汉代董仲舒的改造，孔孟之道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宋代以后，《孟子》一书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一切没落阶级为了复辟旧制度，总是要宣扬孔孟之道，用它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天命 宣扬“天”可以主宰一切的有神论观点。最初形成于殷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阶级利用劳动人民对自然力量的迷信和崇拜，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帝的命令，称为“天命”。奴隶主贵族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说自己的权力是天授予的，凭借“天命”来强制奴隶为他们效劳。春秋末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天命思想也发生了动摇。孔子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竭力维护与宣扬反动的天命论。他提出“畏

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说奴隶制度是“天”的意志，不可违抗，贫富、贵贱也是天授予的，不能改变。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提出“天命之谓性”，把天命和人性结合起来，说奴隶主阶级的人性是天赋的，因而是最合理的。孟子发挥了子思这个观点，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说只要扩充人的本性，就可以通天，成为全智全能者。以后，封建统治者也总是鼓吹“天命”。在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天象谴告”，把地主阶级的意志说成是天的意志。在宋代，朱熹把三纲五常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提出“天理如此，岂可逆哉？”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古代进步的思想家曾对这种有神论的“天命”观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墨子提出“非命”，指斥儒家鼓吹“天命”是“贼(害)天下之人者也”。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否认天有意志，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汉代王充说“天道自然无为”，物质是自己运动的。“天无口目”，“于物无所求索”，天不会有感觉欲望，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命”。唐代柳宗元提出天即自然，它不能“赏功而罚祸”，驳斥了天道、天命之类的鬼话。宋代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公开向孔孟的“天命”论提出了挑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反动派尊孔崇儒，神权是束缚中国人民手脚的绳索之一。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中，对儒家宣扬的这种神权观念，作了极其深刻而生动的批判，对天命论进行了致命的打击。

正名 孔子为挽救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而提出的反动理论（见《论语·子路》）。

春秋末期是个大动荡的时代，奴隶不

断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抬头，奴隶社会原有的统治秩序被打乱了，出现所谓“臣弑君”、“子弑父”、“陪臣执国命”、“庶人议政”的局面。孔子妄图拖住历史车轮的前进，提出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理论。所谓“正名”，就是用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君要象个君，臣要象个臣，父要象个父，子要象个子，这一切都不能乱，不能动。孔子认为，臣服从君，这是臣的名分；子服从父，这是子的名分。尊卑、亲疏、贵贱、长幼都有严格的区别，必须各自遵守名分，不得逾越。孔子对奴隶制的崩溃痛心疾首，要用奴隶社会宗法等级制度（“礼”）重新规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地位，限制阶级关系的变动，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名分是阶级关系的反映，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阶级关系，后有名分。孔子倒行逆施，妄图用“正名”来保住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这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一种反动的唯心论。

《中庸》 儒家的一部唯心主义政治、伦理著作。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西汉时编在《礼记》一书中，内容有改动。宋代朱熹作《中庸集注》，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儒家经典。宋、明、清三代统治者法定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所谓“中庸”，据宋代儒家代表程颐、朱熹的解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最早由孔子提出。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美德”，强调人们应当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按照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办事，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背离。

《中庸》开头第一句就说“天命之谓性”，说人性是天赋的。它用一个“诚”字来概括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说“诚者，自成也”，“诚”是人的本性，同时又是物的本性，“不诚无物”。这样，“诚”就成了世界的本原，客观世界不过是“诚”的体现。因此，它认为人的认识不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而是以自己的本性为对象，只要发挥人性中固有的“诚”，就可以从尽“人性”到尽“物性”，进而达到“通神”、“通天”的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这是一条彻头彻尾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中庸》说“率性之谓道”，这就是说，顺着人的本性（即按照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去行动叫做道，“道”是奴隶主阶级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即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人们的言行必须不偏不倚符合“道”，这就是“中庸”。“中庸”表面上讲调和、折中，其实有严格的标准，它以奴隶社会之“道”为准则，所以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反对奴隶社会之道，就是反中庸。为了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中庸》提出“存诚尽性”的一套修养方法，强调“内省”、“慎独”，要劳动人民从内心反省，排除一切反抗奴隶制度的意识，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心甘情愿地永远当奴隶。

由于《中庸》所宣扬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反动的修养经，对剥削阶级愚弄劳动人民极为有利，所以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它推崇备至。朱熹吹捧说，只要熟读《中庸》，“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以后，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也都鼓吹《中庸》的所谓“诚”。叛徒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则贩卖《中庸》的所谓“慎独”，卖国贼林彪竟胡说中庸之道“合理”，他们都是为了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

利用《中庸》欺骗劳动人民。

法家 战国时期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学派，主张法治，反对礼治，称为法家。代表人物有商鞅、荀子、韩非。

春秋末期，奴隶制开始在各各国出现了崩溃的征兆。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创制“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这些可说是法家思想的先驱。

战国时期，李悝做魏国的相，他“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改革土地制度，保护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吴起做楚国的相，“明法审令”，废除了部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商鞅相秦孝公，在秦国实行变法，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井田制”，确立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规定奴隶生产缴纳粟帛多的可以改变身份。他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主张治理国家要随着时代不同而改变办法，不能墨守旧制度。李悝、吴起、商鞅属于前期法家。以后，荀子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奠定了法家的理论基础。他批判了孔孟儒家的“礼”，并根据地主阶级的利益赋予“礼”以新的内容。荀子所说的礼实质上就是法。荀子的学生韩非，进一步批判了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集法家的大成，完成了法家的思想体系。

法家在思想理论方面，和儒家的思想是对立的。法家反对儒家的天命思想，强调人定胜天，认为天是自然的天，没有意志，国家兴亡决定于人的力量，和天命无关。法家反对儒家的先验论，认为认识是否正确必须经过事实的检验。法家反对儒家的复古主义，确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法家反对儒家的礼治，主张实行地主阶级

的法治。法家和儒家的对立，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对立。法儒两家斗争的性质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是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法家思想符合历史的潮流，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秦始皇采用法家的主张，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制国家。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子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商鞅（？——公元前338年）原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法家的著名人物。初在魏国做官，后入秦国，向秦孝公宣传法家的观点，被任为左庶长（相当于卿），实行变法，严厉打击奴隶主贵族，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秦孝公死后，奴隶主贵族进行反扑，商鞅身遭车裂，全家被杀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进一步破坏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确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变法易俗”，剥夺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建立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把秦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由国王直接委任官吏，以代替奴

隶主阶级的宗法统治。它规定提高生产的奴隶可以改变身份，有军功的还给予等级爵位。商鞅变法的实质是以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

商鞅变法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宣称“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就是说一切都要按照奴隶制度的老规矩行事，不准变革。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也就是说反对古代的旧制度无可非议，而死守古代的旧制度则不值得赞扬。他的结论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制度随时代而变化，决不能拘守旧制度。这场思想领域里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大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两个阶级、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两种制度斗争的反映。

商鞅变法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实行许多重大的变革，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奠定了以后秦国统一中国的基础。

在传称商鞅所著的《商君书》中，记载了商鞅的思想和事迹，可以参考。

荀子（约公元前313—238年）名况，又叫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中，进一步为法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荀子强调“法后王”，反对儒家“法先王”，指责儒家“呼先王以欺愚者”。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礼”作了新的解释，主张按照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奴隶主贵族的财产和权力进行再分配。再分配的原则是“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这就是取消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的制度，确保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

荀子批判了儒家为奴隶制辩护的天命论,认为天是物质的天,不是精神的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体运行有自己固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强调“天人之分”,把天和人、自然和社会区别开来,并认为社会的治乱和“天命”没有关系,以此否定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只要依照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可以使天地万物为人所用。

荀子反对儒家“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他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而要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感觉器官和外界事物接触,然后再经过“心”的“徵知”作用,对感觉到的东西进行分辨和取舍,形成概念。他还提出“性恶论”来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人为(“伪”)的结果,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离开人的阶级性抽象地谈人性的善恶,这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对促进当时的社会变革起了积极的作用,法家的著名人物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的著作有《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年) 战国末期韩国人。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完成了法家的思想体系,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激烈抨击儒家的复古思想,痛斥儒家言必称“先王”的荒谬,他强调政治制度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决不能“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即不留恋古代,不效法旧章,是一位厚今薄古的专家。

韩非提出要实行“重赏严诛”的法治,主张“法不阿贵”,做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打着在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旗号,目的是为了反对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为地主阶级争统治地位。

韩非反对儒家的天命思想,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不会对谁“亲”对谁“疏”。儒家宣称“尧”、“舜”的王位是天给的,韩非反驳说:“无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从而否定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权是天授的。他还说“信卜筮”、“事鬼神”、“好祭祀”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谁相信这些东西就一定要自取灭亡。韩非继承了荀子人定胜天的理论,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韩非反对儒家的先验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否正确必须用实际效果加以检验。他提出不仅要“听言”、“观行”,还要看实际发生的“功用”,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言辞不过是妄说。他要人们不要被儒家宣扬的“仁义”所迷惑,不要“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

韩非的著作有《韩非子》。

征求订户启事

本刊自今年四月份起,交由邮电局在全国发行。凡要订阅本刊的读者,请径向当地邮电局办理订阅手续。每期订费0.25元,每季订费0.75元。

本刊因印数有限,各地邮电局均按分配数额订完为止。

张 勋 传

赵 清

清朝末年,剪辫子和抗拒剪辫子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经过辛亥革命,许多人的辫子是剪了,但也有些人仍保留着辫子。伟大革命家鲁迅在著名小说《风波》中,通过一个船工七斤家发生的风波展示了这种情况。

说的是七斤从城里听到“皇帝坐了龙庭了”,回到家里,叹了口气说:“我没有辫子。”

“皇帝要辫子么?”七斤嫂担忧地问。

“皇帝要辫子。”七斤回答。

有遗老臭味的酒店主人赵七爷,放下了盘在头顶上的辫子,踱到七斤家,不怀好意地说:“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

“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么?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一个好心肠的邻居这样反问。

“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赵七爷生气了。

这个“张大帅”,就是指臭名昭著的“辫子大帅”张勋,事情是一九一七年张勋拥溥仪复辟一幕丑剧在乡村的反应。

盗 匪 生 涯

张勋,一八五四年生于江西奉新县南乡赤田村的一个商贩家里,那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的第二年。张勋的先辈是一伙仇视太平天国革命、与太平军为敌的反动派。张勋八岁时,太平军攻占奉新,打土豪,分浮财,吓得他一家人东逃西窜,只有祖父张崑一留在赤田村没有走。一天,太平军把张崑一叫了去,要他指出当地的地主富室,以便采取革命行动。但这个死硬分子不仅不说,而且还咒骂太平军。太平军把他镇压了。张崑一之死,罪有应得。可是,张勋的父母却将这事拿来教育他,要他仇恨革命,替祖父报仇。

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勋,字少轩,就是要他钻进反动营垒里去建立功“勋”,做骑在人民头上的恶棍。

张勋从小就好吃懒做,又不读书,斗大的字也识不了几个。十四岁时,父母兄弟相继病死,他说“生活日益艰难”,渐渐结交流氓无赖,由偷盗而抢劫,无所不为。他伙同一批小

兄弟,从江西到福建、湖南等地,到处作案。曾在湖南被缉捕入狱,因官匪互通,没多久就释放了。

张勋过了十多年的盗匪生活,感到这个行当终非长久之计,总想另寻门路。他又一次窜到湖南,碰上一个在籍的姓许的侍郎招收佣人。侍郎在清朝官儿已不小,相当于副部长。他凭借走江湖的人缘,混到许家,许侍郎见他身强力壮,可以做粗活,便收留他当伙夫。为了博取主子的好感,有朝一日得到提拔,张勋不得不暂时收敛野性,卖力干活。

几年后,发生了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经常到许家作客的湖南巡抚潘鼎新将带兵到广西前线去,行前要招兵买马,补充部队。张勋心里盘算,这倒是一个投军的好机会,只要许侍郎肯为他向潘巡抚说句话,将来以军功向上爬,一直爬上去,那多好。这几天,他烧饭做菜,特别卖力,侍候也特别周到,尽量使许家吃得开心。有天,他送饭菜给许吃,许吃后很高兴,不免夸奖了几句,他便乘机谄笑地试探说:“听说潘大人要招兵,我想投军自效。”

“你这小子从哪里听到的?”许侍郎问。

“这几天买菜,大家都在说。”

“你不是在我家做得好好的,何必去投军呢?”

“我是愿意当许大人的忠实奴才的,不过……”他怕说下去不合适,望望对方,许仍是笑咪咪的,他壮了胆,便把从小立志怎样怎样,说了一通,然后跪下来,连声说:“请许大人开恩”。许见他这样恳求,答应了。张勋如愿以偿,随着潘鼎新到了广西。

潘鼎新到广西负责东线指挥。他原是李鸿章淮军部下,完全执行李鸿章的失败主义政策,法军还没有来到,他就带着军队溃逃,在溃逃中纵兵掳掠。张勋更是匪性大发,沿途抢劫,有的记载说他表现了“军人与强盗之作用”。在腐败的清朝政府统治下,是败兵有赏,抢劫有功。因此,张勋在这次战争中,居然捞上了营官,管带三百兵。随后他转到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下,驻边五年,欺压人民。

张勋是一个官迷心窍的家伙,一个小小营官,岂能满足他的反革命野心。他在苏元春部下经常闷闷不乐,认为不得志。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他又把民族危难看作是自己攫取军功的大好时机到了,赶快去投靠在东三省负责军务的四川提督宋庆。宋派他领马队到奉天抗日,但屡战屡败,不仅未升官,反而受到谴责。他只好离开宋军,到天津鬼混,吃花酒,逛窑子,捧戏子,过着糜烂的生活。

但是,张勋并没有忘记寻找新的门路,向高枝儿飞去。

血腥镇压义和团

张勋在天津潦倒之时,正值反革命头目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地方组练“新建陆军”。在军队中混过多年的张勋,听到袁世凯来头不小,西太后宠臣荣禄是他的师父,“新建陆军”又是清朝政府的国家军队,由洋教官训练,编制也仿照外国。心想如能投入这个队伍,不愁没有腾达的日子。然而,苦闷也发生了,听说“新建陆军”的军官许多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自己字都认识不了几个,怎么进得去?又听说袁世凯的部下也有没进过军事

学校的，但要能卖命、会打仗的，自己替他卖命可以做到，而两次从军尽打败仗，袁世凯知道了怎么办？他左思右想，还是巴结一个有来头的人作中介，或有希望。

恰好，他在浪荡生活中，结识了一个唱昆腔的名旦周凤林。周经常出入皇宫，为西太后、光绪帝演戏，深得欢喜，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也要另眼看待。张勋便通过周凤林的周旋，投到了袁世凯门下。他在军中，常向士兵宣称：“袁大人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拿出儿子对父母那样的心情来为袁大人卖命！”袁见他如此忠心，很快委派他为头等先锋官，管带工兵营、备补营，兼行营中军事。从此，这个亦匪亦军的张勋，找到大军阀袁世凯作靠山，就步步高升起来。

“义和团，起山东”，大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打教堂、杀赃官，象闪电一般触动着反革命张勋的脑神经。他身在小站，心已飞向山东去抢镇压革命人民的“军功”了。当义和团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时，他成天心神不定，多次向袁世凯表示：“这还了得，再不把这帮‘拳匪’镇压下去，看来要闹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将来连皇上的地位也难保，小子八岁时，‘长毛’搞得我家乡好惨啊！毓贤大人镇压不了，我们带兵去。”袁世凯听了，默不作声，其实，他也早已跃跃欲试。不久，帝国主义主子讲话了，要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带领“新建陆军”前去剿杀义和团。

袁世凯接到新任命，以张勋充先锋，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山东东北部，杀气腾腾地围攻义和团。当时海丰一带的义和团由孙洛泉等率领，与张勋进行激烈的战斗。在团众的英勇反抗中，“新建陆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袁世凯借此扩军，奏准增编马、步、炮队二十营，称武卫右军先锋队，仍由张勋等统带，疯狂围攻义和团，孙洛泉被杀害。张勋供道：“命令我统带先锋队兼巡防后路营，屡次歼灭‘拳匪’于海丰，使阳信、滨州、蒲台、利津等处已无‘匪’踪。”可见这个屠夫民贼，屠杀革命人民是多么残酷。

但是，袁世凯、张勋的屠杀，并没有吓倒革命的人民，义和团除留下一部分人在山东继续战斗外，主要力量向直隶（河北）转移，与直隶的义和团汇合，把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张勋基于对革命势力的极端仇恨，又向袁世凯请战，要领兵追杀到直隶去。袁世凯这时却要巩固已得的地盘当“山东王”，对张勋的请求犹豫不决。可是，一心想把义和团斩尽杀绝的张勋，不等袁世凯的允准，就擅自追击义和团到直隶盐山、庆云，一直进至沧州。袁世凯大为恼火，痛骂张勋：“这小子不听指挥，哪能忠心地为我出力！”随即下令张勋撤军回山东，要他带兵去堵筑黄河缺口。张勋这个莽夫不懂得袁世凯要在山东拥兵自固的用心，为此嘀嘀咕咕，发牢骚。后来，袁世凯接替卖国贼李鸿章担任举足轻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带张勋从山东去保定上任，袁向他解释说：“重要的是兵，要爱兵如命。宋庆、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垮了，他们自己也垮了，难道还不知道为啥要撤兵回山东？”张勋恍然大悟，感激地说：“我这回明白了，袁大人高明！”袁世凯哈哈大笑起来。

保驾有功 青云直上

清朝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彻底投降帝国主义后，逃到西安去的西太后和光绪皇帝，

又要回到北京坐龙庭了。袁世凯派张勋前去磁州迎驾。张勋得到这差事，高兴得手舞足蹈，心想他今后的发迹大有希望了。奉命的当天，他立即带兵起程，昼夜行军，不几天就到达磁州，迎上了驾。

西太后、光绪帝一伙行抵临洛关，下谕旨召见保驾之臣，其中也有张勋。张勋得旨，感恩不尽，穿戴袍褂，学了觐见的仪节，到驻蹕处觐见，恭恭敬敬地向主子磕了三个碰地有声的响头。这时，銮座上传来声音：“既然是袁世凯派来保驾的，那就告诉庆亲王，留下来随扈我们。”张勋一听，立即精神抖擞地回奏道：“奴才谨遵懿旨，护侍两宫平安回京。”

庆亲王奕劻，是有名的贪财鬼。张勋在军中，早就听到袁世凯每年要孝敬他白银几万两。张勋心想：难得地自己被留下来护驾，正好可以攀附这位权势烜赫的亲王。他算了一算，在山东抢到的白银还有五万两，只要得到重用，花几万两银子也值得。主意打定，要求面见奕劻。

奕劻说：“谕旨，我已知道，你留下来保驾，要处处小心，好好布置军队，‘拳匪’在直隶还没有肃清，还在混说要‘扫清灭洋’，两宫很忧虑，才要袁世凯派人来。出了事，就要你的命。”

张勋回答说：“王爷的命令，我牢记在心。奴才从小就立志要替大清朝卖命，一定使两宫万福，可以拿脑袋担保。”奕劻听了，觉得张勋是他们爱新觉罗氏信得过的人。张勋告辞，从身上摸出一封红色的纸包，写着“奴才张勋呈王爷”七个字。奕劻是个接受贿赂的老手，一面接包、一面笑着说：“王爷不敢当”。张勋哈着腰低声说：“今后还要孝敬”。他们拍板成交了。

张勋马上被任命为銮车保驾官，成为皇帝的亲军。这个清朝的忠实走卒，更加死心塌地了，周密地布置士兵警卫。北方冬天，风雪之夜，他来往于驻蹕地，活象一条竖着耳朵的猎犬，鸡鸣兔窜，都会使他坐卧不安，唯恐惊醒了主子的龙梦。清朝朝廷回到北京，对张勋的护驾感到满意，下诏要张勋留京守卫端门。随后提升为四川建昌镇总兵，相当于一个地方军分区司令，仍留京卫戍，他已是清朝皇帝的一条忠实看门狗了。

袁世凯的老搭档徐世昌，一九〇六年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以东三省是清王朝祖宗发祥之地，特奏请张勋去担任行营翼长，节制三省防军，到处搜查“匪巢”，屠杀人民，为沙俄和日本的侵略排除障碍。不久，清朝政府又拔擢他为云南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仍留直隶、奉天带兵，拱卫京师。

一九〇八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张勋哀痛如丧考妣，立即赶到北京，随班哭灵守孝，当时他久离职守，被劾也在所不计，坚持要留守陵墓。后来，光绪帝老婆隆裕太后赏给他一块“淑气清芬”的匾额，以表彰他对清皇室生死不渝的苦心。

在南京负隅顽抗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民主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坐卧不宁，千方百计进行垂死挣扎。光绪帝死去，皇位由载沣（光绪的弟弟）的三岁儿子溥仪继承，载沣为

摄政王。

张勋对儿皇帝依旧忠诚不二，博得了更大的信赖。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清朝政府任命他为江南提督和钦差江防大臣，坐镇南京，控制东南各省。张勋接到新任命，亲往皇宫谢恩，满口表示：“奴才一定看守好陛下的东南大门”。隆裕和载沣温语慰勉，要他仔细注意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太后、王爷放心，他们敢动，奴才就剿尽杀绝。”隆裕、载沣满以为有这个忠实奴才去南京，对东南就没有可顾虑的了。当天，赏他穿黄马褂，和载沣一道听戏，给予无比宠信。

张勋回到住所，连夜收拾行装，把劫夺来的金银存入外国银行。第二天，他带着妻妾、警卫、仆从，乘上专车，车头发出发凄叫声，他去南京上任了。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清查革命党人，武昌的革命枪声一响，各省纷纷响应。南京周围的上海、苏州、镇江、杭州以及九江、芜湖等城市，都相继起义，归了革命党。张勋坐镇的南京成了孤城。他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恐万状，眼看大清的东南半壁，全都完了。但他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了他要负隅顽抗，以百倍的疯狂来镇压革命。他向江防营、新江防营官兵叫喊要为保清保皇而战，不战而屈服，是兵家的耻辱，如果战败了，就给他们占去。并下令凡剪了辫子的，穿学生装的，穿西装的，都是革命党，通通抓起来杀掉。事后，有人追述张勋在南京的“功绩”说：他在南京顽抗达一个月之久，杀死军民数千人，抢劫人民财产数百万两银元，应该“名垂千古”！

张勋的顽抗，张勋的屠杀抢劫，张勋的倒行逆施，只能是激起革命人民的更大愤怒。驻守南京的另一支武装——新军第九镇起义了，城内的会党行动了，监狱里的犯人也造反了，噼噼啪啪，革命枪声四起，吓得南京的清朝文武官员东逃西窜。两江总督张人骏，一闻革命枪声，浑身发抖，化装从总督衙门的狗洞里爬出去。而张勋这个死硬分子，要顽固到底，仍指挥防营官兵顽抗。这次第九镇的起义，因力量悬殊失败了。新军退驻镇江，等待援军。恐怖的乌云笼罩着南京的上空。

为了歼灭顽敌张勋，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人民，纷纷要求参军参战，妇女也组织了救护队。几天之内，组成江浙联军，共一万四千多人，浩浩荡荡开赴南京城外。一场围歼张勋的革命战争打响后，躲在一个秘密地方的张人骏见形势不妙，想随风转舵。资产阶级立宪党人插手进来，派人劝张人骏宣布“独立”，避免打仗。张勋得讯，赶到张人骏的秘密住处，拔出手枪，凶神恶煞地说：“敢有异议者，视以贼，当诛”。那个立宪派代表仓皇溜走。然后张勋再向张人骏说：“你今天同我都是清朝的官，明天你竖起白旗投降，我立刻把你作贼看待。”张人骏应道：“是”。反动派就是这样，是不打不倒的。

江浙联军发动凌厉攻势，连连获得胜利，夺取了幕府山、紫金山、雨花台等战略要地。张勋奔走督战，时而听到这里被攻下，时而听到那里又弃守，急得坐立不安。接着，联军又攻占了居高临下的天保城，大炮轰向张勋的指挥所。

张勋的灭亡已指日可期，他的外国主子出来替他解围了。美国驻南京领事面见联军总司令，要求“调停”，条件是让张勋率领残兵败将离开南京。美帝的“调停”活动，对联军立刻起了涣散的作用，引起联军内部议论纷纷。有的说：“打下去，活捉张勋，千刀万剐，以

解我愤”，有的说：“要张勋把财物退出来，才放他走”；还有人说：“同意‘调停’，条件算了，南京好少受点损失”。众说不一，决定不下来。美国领事进一步施展要挟手法，声称“不接受‘调停’条件，后果你们承担”！转身要走。担任联军总司令的徐绍桢，在洋大人面前软下来了，终于接受“调停”。

战斗停止，张勋得救。当夜，他拖着辫子率领残部数百人，捆载财物，偷偷地从大胜关渡江，经浦口，逃往徐州。

清朝政府不甘心失败，还指望张勋重整旗鼓，收复东南半壁，授他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兼摄江苏巡抚，给予了当年要曾国藩镇压南京太平军的职位。可是，他们的江山已一去不复返，宣统皇帝迅即宣布退位，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一幕复辟丑剧

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领导辛亥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国家政权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窃夺，“民国”成为空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袁世凯把大总统抢到手后，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优待清朝王室，让被推翻的皇帝溥仪，仍坐在龙座上，在故宫里保留着一个小朝廷，接见向他朝拜的军阀、官僚、遗老和胡适一类买办学阀，梦想“恢复祖业”，“光复旧物”。

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社会上的一群臭架子绅士，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活象一个一个道士。他们对清王朝充满着依恋之情，仇恨民主共和制度，成天在想，总有一天要把盘在头顶上的辫子放下来。

逃到徐州的张勋，仍不让他残部剪辫子，公然说：我们还是清朝的兵，清朝的臣，还要做清朝的事。因此，人们称他的军队为“辫子军”，称他为“辫帅”。他听到后，对部下说：我的兵就是“辫子军”，说我只当这点兵的“帅”不对，我要当“大帅”。人们也就叫他“张大帅”或“辫子大帅”。

一九一二年五月，袁世凯派人到徐州，宣布撤去张勋两江总督等职，改派为镶红旗汉军都统，江防营残部改编为武卫前军（后称定武军），移驻兖州。这个革命的死敌就这样被掩护了下来。来人临走，问张勋有什么话要回袁世凯，张勋说：“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如是而已。”就是说袁世凯如仍忠于清王朝，他也就忠于袁世凯。

兖州和曲阜邻近，是孔老二的故乡所在，辛亥革命中，孔老二受到冲击。张勋一到兖州，首先就是保孔尊孔，向革命反扑。他招供说：“废孔说起，人们砍伐孔林的树木，拿走孔庙里的古器，我就派兵去保卫；之后，政府议给孔子后裔衍圣公薪俸，却要没收全部祭田，我又力争，才停止了。”张勋的这些行动，是和当时出现的尊孔思潮互相联系的，是复辟的前哨战。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又将徐州地盘划给了张勋。这时，“兵是重要的，要爱兵如命”的

话，一直在张勋头脑里盘旋。他想没有兵，不多抓点兵，哪有力量恢复清王朝？他向袁世凯写信，打电话，借口还有人捣乱，兵少了，不能对付，要招兵。还派人到天津、上海的外国洋行订购军火，加紧装备他的“辫子军”。两年间，“辫子军”就扩充达两万多人。

既有地盘，又有军队，张勋抖起来了。他的“狗头军师”万绳栻向他说：“大帅，看来复辟时机快要成熟，东北的升允发动了武装复辟活动，王爷溥伟、善耆在青岛、大连也有一批人，遗老劳乃宣、沈曾植、辜鸿铭等有气节，还组织了社团，还有康有为……。”张勋问：“是不是戊戌年要皇上维新变法的那个康有为？”

“就是他，以后逃到海外，成立保皇党，拥护皇上。”

“民国以后呢？”

“他大骂辛亥革命，《不忍》就是他办的杂志，我看过，都是骂辛亥革命，尊孔圣人的话。这些人对大帅都很赞扬。”

张勋边听边想，觉得是要笼络一批人，才能成大业，因向万说：“康有为成立保皇党，我可以搞个复辟党，行吗？”万应道：“大帅说得对，我们组织复辟党，照康圣人的办法。”

“谁叫康圣人？”张勋问。

“大帅！遗老们都称康有为为康圣人，说他是‘文圣’。”

张勋从万绳栻的话中似乎得到启发，欣然地说：“康有为是‘文圣’，我是‘武圣’，我也是圣人。”

张勋同康有为一样，朝思暮想复辟清王室。当他听说袁世凯要做皇帝，将溥清室小朝廷迁往颐和园，自己在故宫登位。他大骂这个老上司“忘恩负义”。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在全国的反对声中死去。他不明白袁世凯的覆灭是由于违背了历史的民主潮流，反而认为是出卖了清王朝。他的复辟活动更加疯狂起来，各种复辟分子象苍蝇一样，从四面八方扑向徐州，帝国主义分子也在这里出出进进，极尽推波助澜的能事。

还在辛亥革命后不久，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伯爵就窜来中国，与张勋复辟集团勾结，通过复辟分子辜鸿铭、沈曾植等人，进行阴谋活动，说什么中国最危险的事是孔教“被废弃”，只有尊孔，才不致于“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为清王朝复辟制造黑舆论。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也以“访问”中国的名义，在青岛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其后，另一个德国侵略分子和张勋达成协议：中国一旦复辟成立新政府，德国就予以承认。日本的反动分子佃信夫等，则经常来往于上海、青岛、徐州间，为张勋穿针引线。

一九一七年上半年，张勋通过四次徐州会议，取得十三个省区反动军阀的“盟主”地位，他的复辟阴谋也得到好些军阀不同程度的默认，张勋已成为复辟的首脑。当时在徐州、河北、热河等地流行着这样的歌谣：“不剃辫子没法混，剃了辫子怕张顺（勋）。”

当年六月，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发生了势不两立的争权冲突，闹得不可开交。张勋以“调人”的身份，带领五千“辫子军”北上，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迫黎去职，把北京政府掏空，为溥仪卷土重来作好了准备。

张勋进入北京后，立即去故宫朝见他的皇上溥仪。溥仪大模大样坐在龙座上，张勋磕

头说：“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指着旁边一张椅子叫他坐下，他又磕头谢恩。六十多岁的张勋，一身纱袍褂，脑后拖着一条花白的辫子，胖呼呼的。溥仪仔细端详着这位将一手恢复大清江山的忠臣。张勋说了句“皇上真是天亶聪明”，一幕心照不宣的君臣会见就匆匆结束了。

许多复辟分子随着拥向北京。康有为带了早已起草的十数道伪诏，和沈曾植一道，匆匆赶到北京。他们麇集南河沿的张大帅公馆，计议复辟程序。他们主观主义地和形而上学地估量形势，以为只要溥仪一宣布复位，各地“望风兴起”，大功就告成了。

六月三十日深夜，张勋和陈宝琛等又鬼鬼祟祟地来到故宫，举行“御前会议”，奏请溥仪复位。七月一日，清帝溥仪复位听政的闹剧正式上演。复辟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向溥仪磕头，呼“万岁”。宣称是“宣统九年”了。

复辟王朝颁布了一系列伪诏，凡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借款合同，宣布一律有效，把做帝国主义儿皇帝的嘴脸完全公诸于众。封官授爵，张勋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副院长，复辟党的重要分子，一一都封为各部大臣和总督、巡抚，群魔乱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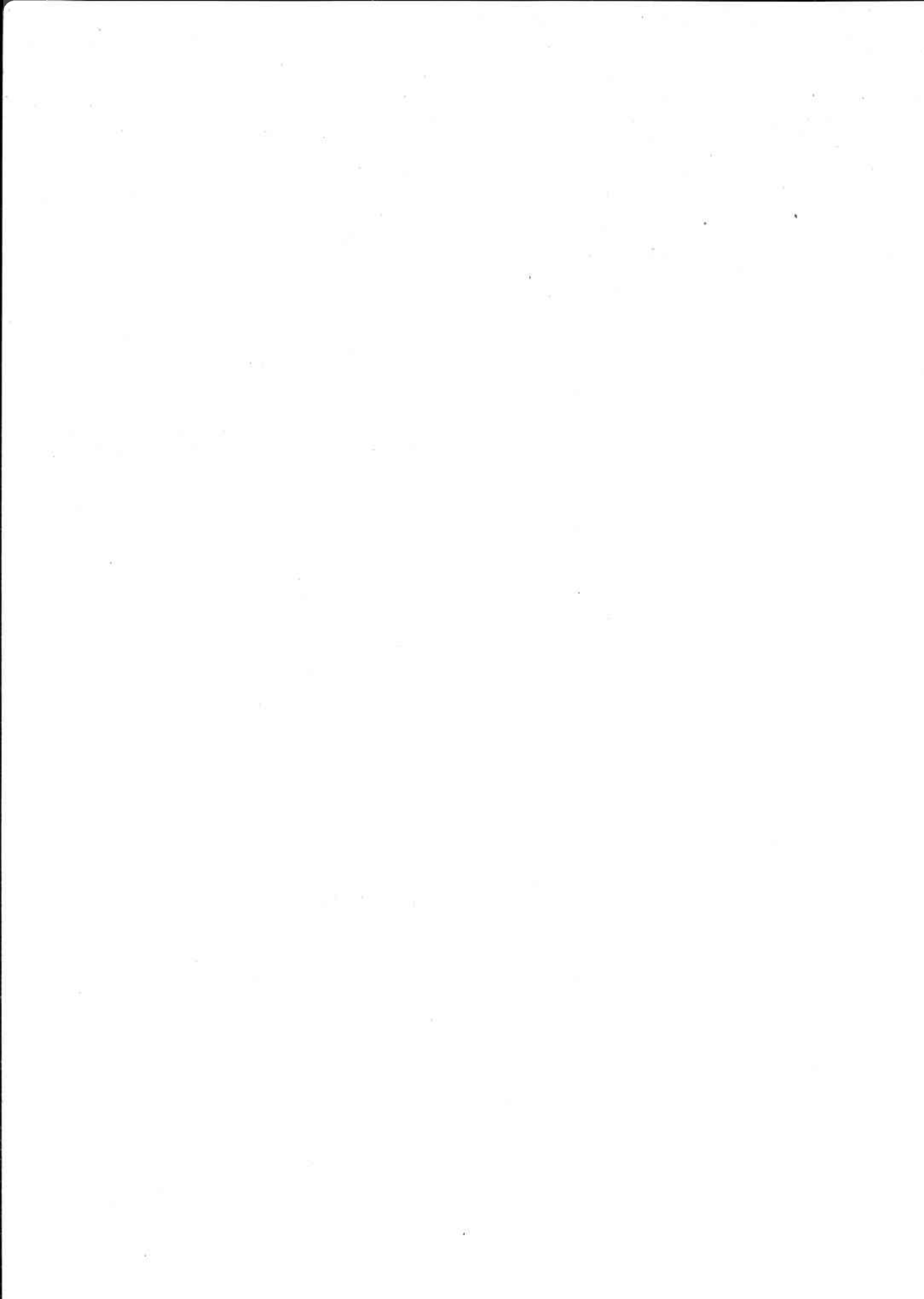
复辟后的北京，挂上纸的布的光怪陆离的龙旗。估衣铺里的清朝袍褂，成了刚封官的遗老们的畅销货；做戏装道具的商店也兴旺起来，遗老和准遗老们纷纷去央求用马尾给他们做假发辫。这些穿着袍褂和拖着辫子的古怪老头，一个个出现于街头，好象古董展览。

“历史的车轮是拖不回来的”。张勋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全国民情，莫不反对”。七月二日，复辟分子郑孝胥在上海买各报查阅，发现“各报皆反对”，只有张勋津贴、康有为办的《国是报》支持复辟。这场复辟闹剧只演了十一天，在一片喊打声中，就草草收场，比袁世凯八十天的皇帝梦，还要短了许多。张勋在两个德国人的保护下，狼狈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以求活命。反动势力的复辟，总是短命的，投靠洋主子也没有用，导演复辟的人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有遗老臭气的赵七爷们的幻想，如泡沫一样破灭了，无可奈何地又把辫子盘在头顶上。

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

张勋逃到荷兰使馆，发了一个通电，说“已获巨罪，人庆大勋”。其实恶贯满盈的张勋，当他走上复辟之路，历史就宣判了他的政治死刑，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乌龟爱王八，只有和他气味相投的一小撮军阀、遗老，才对他念念不忘。的确，有那么几个人，第二年就要求特赦他。一个是徐世昌，是他搞复辟的同伙；一个是曹锟，直系大军阀，后来的贿选总统。张勋被北京政府特赦后，仍不死心，继续在京、津一带干阴谋活动。但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五四运动的登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他只能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悲叹“不复与世相闻”，以“浏览通鉴”来发思古之幽情。死前二年，雇人写了一本变天账《松寿老人自叙》，要他的后人知道他“所经历多艰苦之境”，“倖取往迹以自惕”。就是说要吸取他的教训，“克己复礼”，更狡猾地去干反革命。

一九二三年，他病倒在床，九月十二日死去，带着花岗岩脑袋进了棺材。



一 九 七 四 年

第 二 期

总 第 六 期

XUE XI YU PI 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 0.25 元